



www.duxiu.com
我的武汉

內容提要

這本書里共收集了武汉地区的工人、农民、市民等各阶层劳动人民写的十九篇家史。作者以他們親身的經歷，把新旧两个社会作了深刻、鮮明的对比。字里行間，充滿了他們对旧社会血与泪的控訴，也充滿了对新社会幸福而欢乐的頌歌。表現了他們今天在党和毛主席領導下，献身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設的豪迈激情。

忆苦思甜，不要忘記过去，为的是更好地热爱今天，从這本書里，能使讀者得到階級和階級斗争的教益。

我和武汉

武汉晚报编辑部编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(武汉解放大道 332 号)

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 1 号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 × 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· 2 $\frac{3}{4}$ 印张 · 50,000 字

1964 年 2 月第 1 版 196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T10106 · 531 印数：1—30,000

定价：(7) 0.22 元

向武汉献红领巾

(代序)

郭沫若

武汉,对我来说,有第二故乡的感觉。但这一个第二故乡,比起我在峨眉山下、大渡河边的第一故乡来,觉得更加亲切。

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,我跟随着北伐军由广州翻过南岭走到了武汉,我亲自看到武汉在一个时期成为轟轟烈烈的革命中心地,革命群众夺回了汉口的英国租界,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力量有了新的高涨。然而我也亲自看到国民党反动派投降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,出卖了革命,使武汉三镇像流星一样墜落了。

抗日战争时期,我脱离成为了孤岛的上海、南下至广州,又由广州北上至武汉。我亲自看到武汉在蒋管区内成为轟轟烈烈的抗日中心地,革命群众又一次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高潮。1938年7月7日,通过抗日献金运动所表现出来的人民的爱国热情,呈现出了多么慷慨激昂的场面呵!然而我也亲自看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消极抗日、积极反共的政策,内战内行,外战外行的作风,又一次使武汉三镇像流星一样墜落了。

解放前的武汉,应该说是悲剧性的武汉。还不够强大的新生力量,一次二次地被頑强的反动势力压下去了,这就一次二次地形成了悲剧。然而悲剧的本質,不是哀悼正气的挽歌,而

是驅除邪氣的前奏。武漢終於打破了它的悲劇性，在十四年前的5月16日，作為全中國大解放的一環而獲得了徹底的解放。武漢成為了真真正正的人民的武漢。這是中國人民的勝利，黨的勝利，毛澤東思想的勝利！

解放以來，長江大橋、漢陽大橋建成了，武漢三鎮完全打成了一片。“天塹交通途”，這是亘古以來所未有的事。我們親愛的毛主席在好幾次夏天，在長江大橋下游泳，橫渡萬里長江，這也是亘古以來所未有的事。毛主席的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籠罩着大武漢，撫育着大武漢，大武漢無日無夜地在大步地前進。

人們多說，武漢三鎮到暑天來很熱。但我覺得這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。人民的革命熱情遠遠超過了自然界的溫度，雖然是大陸性的暑天，卻已變成東風駘蕩的春天。不信你去看看武鋼的工友們吧。他們在灼熱的夏季，在通紅的鐵流旁邊，生產熱情卻是無比的高漲！

火車轟隆隆地來，火車轟隆隆地去；輪船上的汽笛、汽車上的喇叭，在天上地下奏着交響樂章。夜闌的千萬家燈火，使天上的繁星失卻了光輝。人們的英雄氣魄，真真正正可以“氣吞雲夢”了。屈原如果生在現代，他不會憔悴行吟，而是會引吭高歌。俞伯牙如果生在現代，他不會摔碎瑤琴，而是彈得使山更高、使水更流，或者使高山成為流水、使流水成為高山。為什麼？因為人民都是他的鍾子期，人民是具有排山倒海的力量。

十四年了。當然，大武漢應該還是一個少年。

今天是六一國際兒童節，我要向大武漢奉上一條紅領巾。

1963年6月1日



統一書號：T10106·533

定 价： 0.22 元

43-1-16

目 录

向武汉献红领巾(代序).....	郭沫若(1)
怒杀恶霸方老九.....	周金扬(1)
鬲马厂的血仇.....	吴举程(9)
一个童养媳和丫头的控诉.....	周凤英(15)
我的血泪家史.....	李春生(20)
难忘悲惨别离时.....	钱亚民(25)
旧恨新爱话渔村.....	李煜海 李开本(29)
冤狱.....	张冶金(33)
一半辛酸一半甜.....	唐家星(38)
我的腰为什么是弯的?.....	谢从勤(43)
从乞丐到人民代表.....	陈 彩(46)
一般引水两重天.....	范希桥(49)
三次投考民生公司.....	陈树槐(53)
忘不掉的阶级仇.....	张凤燧(56)
仇和恨的家谱.....	鲁巧英(59)
育婴堂恨.....	方春霞(63)
当年血泪永不忘.....	方永旺(66)
从做马到做人.....	陈春宝(69)
我也有了名字.....	李淑和(73)
这笔账、子孙不能忘.....	胡 友(77)
编后小记.....	武汉晚报编辑部

怒杀恶霸方老九

汉阳杨泗港装卸工人 周金扬

工农不掌权 血泪洒千年

老住武汉的人，可能还会记得 1947 年 8 月，本市报纸上曾发表一件惊人案件的消息：“同庆里上演血仇，青年街头杀恶霸。”“小汉奸恶贯满盈，周金扬为妻报仇，方老九杀猪刀下丧命。”十六年了，提起那血和泪的仇恨，火就在我心头烧！

1917 年，我出生于“十年九不收”的“沙湖沔阳洲”一个贫农家里。当时军阀混战，像我们这种人家，生无好活，死无好死。父亲给地主家当长工，就是活活病饿而死！娘没法生活，只有到地里去拣撒落的黄豆。黑心的地主宁愿豆子在地里烂掉，也不让穷人拣它几粒，反而诬赖我娘偷豆，又是打又是吓唬，活活把娘折磨死了！娘死了靠大哥吧，不幸大哥又被毒蛇咬死。我那时不满七岁，就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，随姑父逃荒到这“十里洋场”的武汉。开始是牵瞎子混口饭吃，随后因受不了折磨，独自逃了出来，风餐露宿，靠乞讨残菜馊饭过了七年日子。后来又流浪到上海，进了

“救济院”。日本侵略军攻打上海，我又回到汉口，在日清公司六、七码头扛零活（现在的港十一、十二码头）。不久，武汉沦陷了。旧社会的刀子就是前一把后一把的插在我们穷人身上；没地方住，冬天就睡在炕烧饼的炉边，或者是跳板底下；夏天，江堤就是“家”。日清公司是日本老板，欺压人自不必说，中国包头夏清记还从中剝削，榨上加楔。生活苦，活路重，我骨瘦如柴还得将两三百斤重的棉花包，扛上七八十级的江台，一直背到穗丰四层楼上，真是压得我一步一口血。那时候，扛码头的都是这样。哪像现在，天热了有领导给你送甜冰水、綠豆湯、防暑药，貨物上下都用皮带运输机、出艙机、缆車……。

二十岁那年，我和一个农村姑娘夏双芹结了婚，流浪这些年，总算有个家了，受苦人相互体贴，我们情感好得很。不到半年，她怀孕了。

话再回头说。在武汉沦陷之前，球場街一带有个大流氓方老九（原名方秀卿，结拜兄弟排行第九）。人们说：“天見他日月不明，地見他草木不生，人見他失落三魂。”为霸一方，无恶不作。我那时有两个朋友，一个叫徐德生，另一个叫杜三元，为生活所迫，从上海带回五十条香烟和几打万金油，放在我家里。这件事被地痞流氓晓得了，向日本宪兵队告了密。宪兵队派方老九这个奴才带人将徐、杜两人和我妻子一起抓走，关进宪兵队（当时在大学银行内）里。幸亏那天晚上我不在家，沒有落到他们手里。隔壁左右的穷朋友都为我的安全担心，都分途到外面去找我，报告这个不幸的

消息。提起宪兵队，谁都晓得，到了这里是九死一生，我一无金钱贿赂，二无势力托保，连家也不敢回。等了一个月还不見回来，我只有偷偷站在大孚银行对面的巷子口望（南京路口），眼巴巴的望了二十多天。有一天，我看到一辆卡车装了十几个“犯人”出去，回来是空车子，我还从窗子里看到一个日本军曹在擦刺刀上的血。我想到朋友和妻子可能已遭毒手，人都急得晕倒了。不得已，壮着胆子去问一个守门的警卫。他说：“看你天天跑得可怜，老实对你说，方大爷捉来的八九十人，有的灌盐水死了，有的用电触死了，有的被洋狗咬死了，有的……”我听到这里好似乱箭穿心，眼泪直往肚里流。我的朋友和妻子是不在人世了！

回到家里，越想越恨，我就起了杀方老九的念头。方老九住在球場街同庆里，我晓得他经常半夜回家，好动手。每夜我就假装到那里去看皮影戏，等待机会。可是看了几天，不行，别人有势力，经常有三五个带手枪的保镖，下不了手。我是喊天天不应呵！大仇不报，我感到无脸见人，一时想绝了，决定服毒自杀，离开这人吃人的世界。我买了六颗鸦片烟泡，一口气吞了，躺在藕塘的竹床上等死。哪晓得呕吐不止，被人发觉，又抢救过来了。有个穷朋友劝我说：“寻死有什么用，一个堂堂男子汉，要有骨气，要报仇！”一句话拨开了我的心。对呀，要报仇，要为穷兄弟报仇，为妻子报仇。“留得青山在，还怕没柴烧！”这口气迟早是要出的。

拔掉一根毛 难除一只虎

抗日战争胜利了，我一阵高兴，满以为报仇的时刻来到了。开始听说国民党把方老九捉去坐牢，信以为真，心里快活得不消说。1947年8月，我上街打酒，一眼看到方老九同三个国民党军官有说有笑，一打听，原来反动派早把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汉奸“无罪释放”了，还准备委任他在刑事处便衣队工作。我恍然大悟，原来他们是一根树上的蛀虫呵！我见方老九是眼中钉，方老九见我也像肉中刺，他放出风声说：“不把小沔阳（那时我的外号）干掉，留着是条祸根。”我听了拍桌一掌，牙齿咬的格格响。心想：人死不过头落地，先下手为强，不是鱼死就是网破！要是他再抓住枪杆子，还有我们穷人活的命。第二天，我就买了一把杀猪刀，请朋友王保太磨得雪亮。那时我又接了亲，就和爱人商量这个事情。她开始不同意，后来见我报仇心切，同情我的身世，才勉强答应了，并劝我报了仇后远走高飞。于是，我又请人写了张状纸交给她，我想，万一我坐了牢，她也好告状伸冤。

8月15的晚上，我打了一斤汾酒，带了个黑框眼镜，搬个竹床到同庆里口“乘凉”。边喝边想，伤心的往事一起涌上心头：父母和哥哥的惨死；怀孕的妻子被杀；头佬的压迫，方老九的恶毒……恨得我青筋直冒，怒火烧心。这些仇谁替我们穷兄弟报呢？要是有个正直的法官，将这些家伙统统杀光，我周金扬粉身碎骨也情愿呵！没有，只有戏里有包

公！喝着喝着，不觉十一点多钟了。忽听得耳边有“再见”之声，我抬头一看，正是方老九送客，来得正是时候。我连忙戴上黑眼镜。等他的客人一走开，喝声：“方老九站住！”话没落音，上前就是一刀，方老九一闪，刀子刺在右肋下面，没中。方老九他也有一手，反身一把抓住刀把，大喊：“杀人啦……！”一面摸他腰上的武器。我竭尽全身之力一扑，两人滚在地上，我一只腿压住他的右手，挣起身子向他肚子捅了两刀，这个为害一世的坏蛋，像死猪一样再也不能动了！这时，街上已围来很多人，有的说“杀的好！”不知此中情况的就喊“杀死人啦！”我一看逃是逃不脱了，便拍胸对他们说：“不要喊，是我周金扬杀死汉奸方老九！”好汉作事好汉当，径直向伪公安十二分局投案去。路上，方老九的猪兄狗弟刑事队、稽查队都围来了，我大喊：“冤有头债有主，闲人站开！”那一群怕死鬼，吓得连退直退。投了案，公安局不敢处理，转到法院。

杀了一个恶霸，更多的恶霸把我看成眼中钉。在我关在牢里的时候，朱黑子（朱钦学）扬言要杀我六个月的女儿小云。我托人写了封信给他，警告他说：“谁要打死捏死我的小云，只要我周金扬活得出来，当心比方老九更惨的下场头！”这家伙晓得我敢说敢做，挨也不敢挨小云一下。

开堂审讯了。堂上坐着个穿“和尚”衣戴高帽子的法官，装腔作势地问：“你为什么无故杀好人？”我说：“我杀的汉奸，他杀了我怀孕的妻子，杀死了无数中国同胞，我要为民除害！”法官说：“除汉奸是政府的事，你无权管。”我也回



他：“你们政府不仅不管，还要委任他当官！”法官一听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这时方老九的小老婆在堂上要赖，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要政府“惩办杀人凶手”。我气得把眼一瞪，吼道：“你再要赖，老子割掉你的鼻子！”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，吓

得气都不敢出了。法官到了这步田地，拍起桌子蛮不讲理的说：“你只说是不是杀了人？”我喝道：“杀了，杀了，杀了汉奸！”他连忙站起来宣读判决书，判我两年半徒刑。本来他们可以杀死我，只因报上一登，消息传开了，在群众中引起公愤，他们才不敢。我想，坐牢就坐牢，出来之后，老子再同你们干！穷朋友们听到这个消息，都认为我干得好。他们经常去看我，送东西给我吃，还到处替我控诉。给我很大的支持，增强了我斗争的信心。

坐了一年零三个月的牢，跟着武汉快要解放了。国民党那些猪官狗吏吓得屁滚尿流，纷纷逃命，把我“提前”释放了。出狱之后，还是在码头上扛活，还是受恶霸的打骂。有的恶霸扬言要杀我，我说：“不怕，一个换一个！”他们欺软怕硬，不敢动手。又有的用软办法啦，叫我当个头佬拿剝削钱。我说：“搭肩背惯了，不拿不出力的钱！”又给他们碰了一鼻子灰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一位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找到我，对我讲了一些革命道理，我才懂得，杀了个把坏蛋，只当拔了老虎身上的一根毛，一点不管用；要全中国的受苦人解放，非打死老虎不可！才懂得光报个人的仇不是办法，要为整个阶级复仇，进行阶级斗争。

化恨为力量 建设立功劳

卧龙也有翻身日。解放了，我们工人扬眉吐气了。民主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中，斗倒了恶霸、特务、把头。鲁老十、张汉清、傅占奎、朱黑子等这些罪大恶极的家伙都镇压了，

党给我们报了总仇。我一身是劲，拚命地干活。1952年在荆江分洪工程中，一百多斤重的担子好像灯草一样轻。那时工程急需一批大石头，从外地运来不及，天寒地冻，我把棉衣一脱，钻到水下去摸，一天就摸起一吨，解决了工程急需。我是为祖国的农业丰收出力，为我的“十年九不收”的家乡出力，怎么不卖劲？这一年，我被评为特等劳动模范。同年，我加入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。1954年，又被评为长江区的劳动模范、防汛功臣。1956年又被评为武汉市的劳动模范。还两次出席了北京的群英会，见到我的救命恩人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。当时我激动得流泪了。我还到庐山和北戴河休养过，这难道是十四年前的“小沔阳”做梦想得到的么！如今，我的大女儿小云在读初中二年级，老二老三都在读小学，我经常对他们讲：“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我们活的命。要记住阶级仇恨，听党的话，为社会主义事业献出一生！”

宋大么、黄安心、陈锡炎整理 舒 华插画

閱馬厂的血仇

烈屬 吳舉程

这是三十四年前的事了。

我的丈夫程尚志是汉阳鸚鵡洲人，是个放木簰的。人们说干这行当是吃“水狗子饭”。一有生意，不管天南地北，風吹雨打，拚命也得替老板干。记得有个六月天，他这簰到江西，谁知一下发了洪水，把簰冲散了一部分。到了江西，买主不依，沒给一分錢，他只有讨饭回来。

那时有位叫乐烈安的同事，秘密的参加了革命。他同尚志要好。受苦的人联上了解放工农的党，上刀山也願意跟着走。因此，尚志就同他们一起闹起革命来了。1927年，大革命失败，我们搬到汉口松柏里。名义上与老乐做木材买卖，实际上是个碰头的地方；经常夜晚有十三四个人到楼上来开会。房子像鸽笼，十几个人只有贴得紧紧的坐在地板上，又热又闷，蚊子成把的抓，而他们一开五六个小时，连地板都让汗水滴湿了！我也不懂得么事，只能给他们望望風，送点茶水。有一回，我送两把扇去，他们还说：“大嫂子，劳为您，只要会开得好，我们的心就凉爽了！敌人的枪子都打不进我们的骨头，还怕蚊子吗！”

那时，国民党反动派穷凶极恶，天天都在杀人，哪里看不到革命者的尸首？即使这样，我丈夫和同志们还在活动。在松柏里住久了，怕引起敌人注意，就在1930年夏天搬到济生一马路来了。也是以开店子作掩护。由于叛徒的出卖，过了两个多月，就出事了！阴历八月初一的夜里，尙志刚回家，国民党的宪兵一下包围了房子，将我丈夫捆走。敌人走后，为了保护党的安全，我将尙志藏的文件全部烧掉。一个星期后，才打听到他被关在慈善会里的宪兵大队。我去看他时，只见一个漆黑的小房间，关了三十几个人；有的躺在地下，有的靠着墙。个个脸色苍白，衣服上血迹斑斑。大小便都在房里，一股臭气令人作呕。尙志呢？我找了半天没有看见他，直到他走到我跟前才认出来。捉走时是穿的一套白单衣，现在血肉和衣服粘在一起，变成一件黑一块红一块的血衣了，手像断了一样向后拖着，脚肿得像水桶。原来他关进去七天，就受了六次惨无人道的刑罚：踩杠、绞杠、坐老虎凳，敌人还把很长的针一半戳进指甲缝中，露在外面的半用火烧……，但是，敌人什么口供也没得到。看了他那副样子，喉咙里像塞进一块石头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他开口问：“这几天家里都好吗？”这是暗语，他在担心其他同志的安全。我说：“大家都好！”他听了立刻露出笑容。离开他时，我帮他脱衣服下来换，谁知衣一扯，血就喷出来了。我的心像刀子一样的割呵！他还打趣的说：“这是敌人给我贴的狗皮膏药，以后再给他算钱！”我用汤匙喂饭他吃，他咽不下还死劲的吞。说：“多给我送些饭来，好熬受敌人的毒

打！”

又过去了十多天。敌人看见制服不了尚志，便想出了更毒的花招，把我也抓进去了，在一间很阔气的房子里，他们像接客一样假惺惺的接待我，有个歪头稽查一脸假笑地说：“只要你说出地下党的活动，马上放你先生同你一道回去。”我晓得这是计，就回答“不晓得！”他一看我这样子，冷冰冰的一笑，要紧不慢地说：“你不要太固执，年轻轻的，往后的日子长啊！好好想一想，跟共产党是死路一条。人心是肉做的，难道看见丈夫那样不救吗？”我也气冲冲地回答说：“就是把我杀了也不知道！”这家伙看到话说绝了，脸马上一黑，鼻子哼了一声，喊声“来人啦！”只见十几个刽子手涌了进来，又是枪又是鞭，像吃人的老虎一样围到我跟前。我的心霍地一惊，知道他们要动刑了。要是招了，岂不害了更多的同志们，决不能说，想到这里心定了，我把牙一咬，喊声“不知道”！这时，他们就拖出皮鞭没头没脑的打，打得我皮开肉裂，鲜血直流。后来一个女稽查就将我拖到关我丈夫的牢房里。进牢房一看，天哪，他们用七寸的大洋钉把我丈夫钉在一个架子上，洋钉从手心和脚背穿过去，鲜血直流。我看得心都要炸了。敌人见他不招，就逼着我招。我心一横，和他们拚了。骂道：“共产党杀不尽，你们杀了我丈夫一个，还有千千万万人为他报仇！”这些畜牲就用红烙铁去烙尚志，肉被烙得吱吱响，冒出一股臭烟。我拚着命撞上去，喊着要他们一枪将尚志打死。稽查说：“他死了，谁招口供？”说完将我拖进另一间小房子里。以后每隔一天来一两

个人审问我，都碰了一鼻子灰回去了。到了第五天，就将我放了。

隔了两天，忽然有一个叫花子来到我家门前，我定神一看，原来是老乐。他看周围没人，悄悄地说：“党知道你回来了很高兴，现在要我来看看你。希望你忍受更大的痛苦，迎接更艰巨的考验！”说完塞给我十块光洋就走了。

以后，敌人又把尙志解到友益街警备司令部。不久又被押解到武昌文昌门军法处，这是国民党杀人的窝子，到这里后不死也要剥层皮。我又去接见了一次。他是被人搀着出来的。见面后他第一句话就说：“以后你不要来看我了。”我问他为什么？他说：“敌人将我没法，可能给我最后一条路。你不要伤心，我们没有孩子，将来会有千千万万的儿女给我报仇的……”我一听忍不住眼泪淌了出来。还没等我们说完话，就被看守赶了出来。

1930年旧历9月8日，天上满是乌云，像快要下雨的样子。我从街上回来，邻居告诉我，说尙志的四弟刚才来过，叫我马上过武昌军法处去。我到了武昌军法处的对面茶馆，尙志的四弟在茶馆内一见我就哭了起来，说尙志在早上六点钟在阅马厂被敌人枪毙了。我一听，像根木棍打在我头上，天旋地转地昏了过去。大家用开水把我灌醒过来后，旁边看的人也陪着流泪。他们告诉我，敌人一共枪杀了九个同志。并说，烈士们死得英勇，当敌人用汽车拖他们到刑场时，他们一直高呼：“共产党万岁！”“工农万岁！”“打倒帝国主义！”“打倒国民党！”到了刑场，敌人要他们跪下，他

们一个个笔直的挺着，有的人被敌人搵着跪下后又站起来！

我和四弟赶到阅马厂，烈士们的尸首已被敌人运到了洪山。在晚上搬过江的时候，我看到丈夫的鼻和口角处都是血，他那威武不屈的形象，使我化悲痛为仇恨。

尚志死后，葬在汉阳十里铺（现已重修坟墓，立了烈士碑）。老乐来安慰我说：“你不要难过，革命成功后，你会生活得更好的。”当时我只有三十三岁，第二年阳历三月，我进了观音阁“敬节堂”。“敬节堂”真是一座监牢，大门一年四季都用半尺长的大锁锁着，“节妇”带去的小孩上学进出要坐转筒，除了三月和七月（旧社会上坟和烧纸）准出来两次（规定只有几天时间），平时想见娘家的亲人也不行。一个月全部费用只发两块錢，真是过着非人的生活。在日本人侵占武汉时，我才出了“敬节堂”随娘家过活。在旧社会苦苦的熬了二十多年，直到解放。

解放后，真像我丈夫和老乐以前所说的话一样，党给我在鸚鵡洲安了家，过着幸福的生活。十多年来，党为了给我治病不知花了多少錢，1963年在市五医院、四医院住了半年多，才把被敌人打伤的腰治好。街道和周围的邻居对我更无微不至的照顾。有一天，街道的党总支陈书记听说我出院了，冒着倾盆大雨来看我。他见我行动不方便，第二天就派人来侍候我，我喜得流了眼泪。心想，自己年纪大了，又沒为人民做点什么，怎能要别人服侍呢，所以辞谢了。

现在，我只要到利济路口，见到那座已经做了“武汉聋哑协会”的房子，只要经过阅马厂，看到那“湖北劇場”和花

园,我就恨反动派,就想起丈夫和烈士们的血!每当我到丈夫坟上去看时,望着那一排排巨大的工厂、机械化的码头,心里就由痛变喜。尚志死的值得呵,这些不都是烈士的血,工人的汗换来的么!

樊明杰整理

一个童养媳和丫头的控诉

滨湖篾器合作社主任 周凤英

凄惨的一家

提起往事，真是一字一泪，叫人心寒。我是四川梁山人，父亲一代，兄弟六房人都在病饿交逼中陆续地死绝了。父亲是个石匠，家产除了几把凿石工具，几棵橘子、柚子树以外，其他一无所有。母亲生了十六胎，都因为无衣食养不活而死了，只剩下我和妹妹二人。我七岁那年，父亲得伤寒病不治而死，母亲把仅有的几棵果树卖掉，换了一口匣子把他埋葬了。没隔四、五天，伯父和哥哥也相继死亡，连匣子也搞不到一口，用草裹席卷埋葬了他们。几天之内的突然变化，搞得家破人亡。这时，债主们看到我们无法还债，就不约而同地涌到我家里来，把父亲的石凿工具和被窝都抱走了。母亲见走投无路，只身带着我和妹妹外出讨饭度日。妈妈眼看苦不可忍，日子过不去，就将我把给人家当童养媳，当时才九岁，临走时，别人把我装在背篓里，上面还用一块黑布蒙起来，怕我记得路跑走了。就在这时候，我母亲也改了嫁。

牛馬不如的童养媳生活

到婆家第二天,就开始干超过我体力几倍的笨重劳动。从早到晚打猪草、挑水、打柴、推磨,晚上还要纺棉花,纺不到一砣不能睡觉,睡不到二、三个小时,鸡叫就得起床。刚离母亲怀抱的幼女,哪能吃得消这种苦呢!但是恶婆婆见到起床稍晚了点,拿起烧火棍就打,我的背脊骨就是这样被打断的,现在遇到天气不好还很痛。做活找我,吃饭没我,婆家一家六、七口人吃的是白米饭,而我吃的是碎米加糠的锅粑粥,从来沒有和他们吃过一样的饭。做活若不如他们的意,连糠粥也不给我吃,婆婆说:“喂猪还可以杀肉卖钱,你吃了有啥子用?”每天挨打受气,成了家常便饭,除婆婆打以外,她两个儿子也打,我被他们一家人打怕了,有一次我跪下哭着求饶说:“你们不把饭我吃都可以,求求你们不要再打了。”而他们狠狠地说:“不打不成人!”好心的邻居们看下去鸣不平。他们骂人家,说什么“打死是我家的鬼,不与你们相干!”婆婆吸鸦片烟,每天要吸三、四遍,把家中东西卖光了,沒有钱就叫我出去偷菜换钱买烟。我不愿出去偷是打,出去了偷不回来也是打。有一次我背着篓子到外村偷了伪保长的萝卜和榨菜,被他抓住了,问我是哪里人?我不敢说,他就连打几个嘴巴,没办法才说是婆家的童养媳,于是伪保长就把我揪到婆家。婆婆为了向伪保长讨好,自己装好人,一面恶骂,一面就把我拖倒在地踢了几脚,又用绳子把我绑在树上,等他们一家吃过了饭,又将我反手往树上吊起来,

树下有一个牛滚水的污水氽子。他们往上一拉，往下一松，把我弄得死去活来，直到夜深人静他们才丢下我回屋里去。这时隔壁好心的刘大娘，偷偷地松了我的绑，看我难得活下去，就指点叫我逃走。我逃到妈妈那里，妈妈一见我混身青肿，骨瘦如柴，不由一阵心酸，抱头大哭。但她已嫁到人家，怕被外人发觉，又怕婆家来找，就把我藏到柜子里，一连关了三天；在第二天婆家果然来了人，有的拿着绳子，有的拿着锥子和黄豆（四川有个封建统治的规矩，对所谓不规矩的媳妇，要用锥子在身上锥一个洞按一颗黄豆，使人活活烂死）。妈妈装做不知道反问他们要人，这下子把他们搞得很狼狈地走了。我总算是幸运的躲过了这一关。

做了头，苦上加苦

躲在妈妈那里，继父不喜欢，又怕婆家来要人，不是长远之计，经舅舅的亲戚介绍，到一个姓袁的地主家里当丫头，母亲要我去我不想去。妈妈说：“你不去，婆家找来要割耳朵挖眼睛的，连我一家也不得了呀！”我一听浑身直打寒颤，只好同意去了，那时我才十二岁。这个姓袁地主家有三口人，却用了五个人来服侍他们。我是他家的丫头，取名叫“菊香”。一进地主门，就擦烟枪、洗地板、打洗脸水，多的时间就打猪草打柴，受的苦和当童养媳差不多。有一次我和别的小孩玩去了，一不小心，小少爷摔了一跤，头上跌个包，地主出来，不问青红皂白，拿起铁火钩就往头上打，打得我满头鲜血顺身往下流；又一次给地主泡茶，不小心杯子打破

了，地主从打牌桌上站起来就是几个嘴巴，踢了几脚，又随手拿起棍子浑身乱打，打得我三天不能起床，一块块紫血块子布满全身。以后慢慢长大了，不打猪草了就侍弄地主的家务事，洗衣服，做鞋子。我长到十六岁没穿过新鞋，没穿过棉裤棉袄，都是拣别人的破烂，有一次地主要我给伪保长送礼，因为穿的破烂，又提个篮子，拖个棍子，保长的狗当我是讨饭的，窜上去浑身乱咬，身上伤口烂的长了蛆，没有药治，还是找人家讨点眼药敷好的。地主吃饭我站在后面一碗一碗的添，夏天，这个只有三十多岁的地主对我起了歪心思，突然对我好起来，不打我了，还给我做衣服穿，要我给他捶腿，乘机调戏我。我把这事告诉了老妈子，地主婆听到这个风声，就叫长工把我送走了。

被騙卖，受糟踏，苦不堪言

出地主火坑以后，在妈妈那里住了一些时，这时我只有十六岁，苦于生活无依靠，找生活出路的心切，那知，不久竟被人拐骗卖给一个姓曾的，他有二十八岁，浙江人，在梁山开个酒铺，是一个流氓和兵痞子。结婚后我才从他口里知道我被人骗卖了二十块现洋。在他家三年多，不知受了多少罪，挨了多少打。当时我蓄个长辮子，他踩着辮子打，有次头被他打破了，鲜血直流，我只好将辮子剪了，用烟灰敷上。他不顾我的生活，我只好为别人洗衣服，做针线，搞几个钱度命。我怀孕到临产的那天，还洗了六床被窝。后来听别人讲他家已有老婆孩子，来信要他回去，他要去浙江，

我不願去，并在周圍群眾的支持下，堅決與他離開了。離婚後，我到一個煙廠做臨時工，和現在的爱人結了婚。

永遠不能忘記過去

1949年，共產黨解放軍打垮了國民黨反動派，我和千百万勞苦群眾一樣獲得了解放。我隨爱人來到了武漢，爱人參加了工作，當了建築工人，1950年，我經市婦聯介紹到江漢被服廠做工，1952年，參加了街道工作，經過一系列的政治運動，使我的階級覺悟有了很大的提高，使我更加熱愛新社會，仇恨舊社會。1954年防汛鬥爭中，我奮不顧身的積極干，因此，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，還在婦聯訓練班和黨校學習。1958年，我正式參加了工作，當上街辦磚瓦廠廠長，蔑器社主任，這一切是我過去做夢也沒想到的，真使我歡喜若狂。我经常想，如果沒有黨，我早都不知被怎樣糟踏了。我這條命是黨和毛主席給我帶來的。

中共洪山區委供稿

我的血泪家史

消防江汉中队 李春生

我五岁就死了父亲。十四岁的时候，就到华清街杨聚和福记当学徒(弹花)。每天起早睡晚的摇纱、做饭打水、递茶端饭。挨打受气是不用说了。我人小力薄，每天关门还要上门板。有一次，奔着门还没站起来，身子一软，哗啦，门打在我身上，玻璃打破了两块。老板毫无怜念之心，还将我饱打一顿。这种生活实在忍无可忍，就在1936年回到故乡湖南了。

回家也没法生活，只有去学“鼓乐”。那时候，有钱人是贱视我们的，说“吹鼓手是守门狗”。后来由于老板的残酷剥削(对分帐)，养不活老小，只好改行唱渔鼓弹词混口饭。停停唱唱，一直熬到1945年日寇投降，心想，日子总该好过一点吧，不呵，生活是更难了。经常跑一天赚不到分文；回到家里，你望着我、我望着你，两个小孩饿得眼泪滴，作父母的心像刀割！

1946年春天，在湖南老家实在养不活家了。无路可走，只得将第二个女儿爱秋送给别人当养女，把雨伞和穿的衣服都卖掉，老小七口逃到汉口来谋生。来了之后，好容易找

亲戚借了五万块伪钞的高利贷，在六角亭菜园中间盖了一小间茅草棚安身。扒开草走路，低着头进屋，连门也没有一扇。棚前是一个个的粪坑，棚后与铁路之间，夹着一条臭水沟。沟边和堤埂上，每天都有丢来的尸体。太阳一晒，野狗一拖，一股股的尸臭被风吹来，叫人作呕。这就是我们的栖身之地。吃没吃的，穿没穿的。一家人只有一床又薄又烂的被子，你扯我拉的冻得整夜睡不着。孩子在大雪天打着赤脚去讨饭，讨不着就挨饿。我们一饿几天是平平常常的事呵！我就靠卖甜酒过活，挑得汗流浹背，还吃不上半饱，有时就赊斤把糊锅粑充饥。有一回，我卖甜酒走到六渡桥，一个伪警察想不花钱吃甜酒，我不卖帐，他硬将我拖到警察局，关到下午四点钟才放。甜酒坏了，连本带利丢得干干净净，你教我到哪里去申冤！

那一年9月23日，第三个孩子刚满五岁，得了痢疾。他母亲抱他到梅神父医院去求诊。医生说：“要得好，一万块钱一针，打两针见效！”可怜，饭都糊不到口，哪来这么多钱呢。我们只有苦苦哀求。“不行，少一文钱你抱回去！”没有办法，只有含着眼泪往回走。又是病，又是饿，孩子在床上滚来滚去。挣扎了一会，突然爬起来，溜下了床。脚手战战兢兢的像筛糠一样，站不住，自己又爬上床去。拖着有气无力的嗓音，甜蜜的叫了声：“妈妈，爸爸！把点饭我吃吧，开水也好，……”水没钱去挑……开的，也没柴烧……饭也没讨到……同志呵，作父母的见到孩子饿得这样，只得到附近邻居去讨点开水。但那些有钱的邻居，看到我穷，讨



厌得很，说：“我家炊壶掉了底。”可怜，我穷得连一壶开水也烧不起。那个社会，人快死了也没有人望一下。就是这样，

我们眼睁睁的望着孩子病饿死去！这还不算，过了四天，第四个孩子由于家里没有一分钱买自来水，只有去喝臭泥沟死尸腐烂的污水，谁知又中了毒，嘴里的肉，一丝丝的随着涎水吐出来。一气接不上就毒死了！死了破木匣子也没有一个，只有用半截烂草席卷着，在铁路边埋了！真是叫人伤心啊！

冬天来了，正是穷人过鬼门关的日子。偏偏第二个女儿由于受不了虐待，从湖南找来了。要饿死也一起饿死吧，总比把别人折磨死强。她也只得在风雪交加的日子，挨门靠户去讨饭度命。我爱人呢，从早到晚帮别人纳鞋底。记得11月20号，她赶死赶命的将纳好的鞋底送去，别人说：“谁叫你纳得这么快！三天后才有钱！”饱人不知饿人饥，我们有什么办法呢！没办法，爱人只有说：“孩子的爸爸，这样饿着不行，还是把我身上这件旧毛线衣脱下来卖掉度命吧！在这暗无天日的社会，饿死也不会有人同情。太阳总有一天要晒在我们门口来的。”她边说边脱。可怜，正是寒风刺骨的天气，我拿着热烘烘的毛衣去换几升细米，真是像刀子割心呵！

第二年2月11日，母亲终于受不了饥寒交迫的折磨，冻饿而死了！没有板子钉棺材，躺在地下三天无人过问。最后还是我找同乡磕头，才弄了一口匣子埋了。照说，人到这个地步，债主也不会上门了吧，不，那个姓胡的老女人，还天天上门来逼“胯子帐”（高利贷）。她凶恶万分地说：“限期三天，三天如果不把钱，放火烧掉你这个烂草棚！否则把你

的第二个女儿给我抵帐！”听了这话，我们楞了半晌，敢怒而不敢言。那一夜我们夫妻哭的眼泪湿透了枕头。商量的结果，也只有送肉上砧板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哄着八岁的女儿，叫她一声：“爱秋，今天跟爸爸走人家去吧，有饭吃，有肉吃！”她哪里知道是用她去顶债呢，还满口答应：“好！好！”我牵着她那只嫩嫩的右手，匆匆忙忙的送到胡太婆家里。她硬逼着我写张字为凭，说：“父女二人，生不见面，死不烧香。”看，杀人不见血的旧社会和高利贷者，就是这样一刀砍割了我们骨肉之情。一家七口，至此只剩下我们夫妻和大姑娘了（爱秋后来受不了折磨又送回家来，不久又送给别人，被折磨死了！）。当时有钱的人说我的命不好，八字所招，你冻死，你饿死活该！这完全是胡说。说我“命”不好，为什么所有劳动人民的命都不好？解放后，我们的“命”一下全变了呢？

解放了，我们从地狱里走了出来。我住了有电灯有自来水的钢筋水泥楼房，成了人民的消防人员，过着幸福的生活，从来也没有为生活操一点心，有了点困难，党和组织上多方照顾。解放后，我又添了五个孩子。大姑娘参加了部队工作，是共青团员，老二老三老四都在读书，其中两个是红领巾，爱人也参加了街道工作。这些幸福是几天几夜也说不完的。我只有忘我的工作，来感谢党和毛主席，并教育我的子子孙孙，永远不忘党的恩情，为人民，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到底！

蔡 培 插画

难忘悲惨别离时

武汉电池厂工人 钱亚民

1944年，我八岁的时候，日寇侵入广西，国民党吓得屁滚尿流，连忙往贵州逃命。那时，我父亲在国民党的一个被服厂当工人，工厂撤退，工人要吃饭，只好跟着退。当时，仅有的火车都叫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资本家包了，我们家穷，买不起黑市火车票。不跟着厂跑，怕丢了饭碗，又怕遭日寇的蹂躏，便只好带着母亲、姐姐、我和小妹妹，从柳州动身，步行去赶厂。

刚刚上路，父亲和小妹妹就染上了痢疾，没钱医治，不几天，活蹦活跳的小妹妹就病死了。身边没有钱，只有将带的衣服杂物边走边卖，看看快全部卖光了。由于连日的奔波劳累，父亲的病越来越重，我们也饿得实在支持不下，走不动了，于是在公路边找了个小山涧歇了下来。我和姐姐去寻了些稻草，让父亲躺着，又去扯了点野菜，用剩下的唯一的一只小铁桶煮着吃了。就这样又熬过了一天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父亲的精神似乎好了一些，我们也都起来了，母亲正把一些破烂往铁桶里拣。这时父亲把我们母子三人拉在身边，摸着我们的头，噙着眼泪，看看姐姐又看

看我，过了好半天才有气无力的对我们说：“我的病三两天内不会好了，人也走不动了，你……你们走吧！”听了这话，我们都吃了一惊，眼泪只往下掉，母亲的泪水也扑簌簌地落了下来，四个人哭在一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临了，还是爸爸对妈说：“这样吧，你们走得慢，你领着你们先走一步，让我在这里休养一两天，待身体好一点再来赶你们吧！”又说：“你们先走，赶上了工厂，讨点救济借点钱，回头再来接我也是好的。”母亲一想，也是对的，大家呆在一起也不是办法，只要能赶得上工厂就好了。她怕父亲知道不依，偷偷留下了最后一点干粮，又哭了一场，最后才带着幻想，在父亲的一再催促下，带上姐姐和我先走了。走了好远，还见父亲靠着洞口目送着我们。

我们走了一、二十里路，远远看见一个村子火光四起，烟雾冲天，知道这是日本鬼子和“皇卫军”干的勾当，便急忙掉转头来往回走，一进山洞，就见父亲迷迷糊糊的躺在稻草上。他的病势更沉重了。见我们回来，他强打起精神，问我们为什么打回转，妈说：“跑出去也是个死，倒不如让我们都死在一起痛快！”并表示要走一块走，要留都留下。父亲听了这话，半晌都没吭声。就这样，我们又在一起挤了一夜。

那天晚上，父亲一直都没好好睡，终于叫他琢磨出了催我们上路的“新办法”。次早起来，便一个劲地催我们先走，我们不肯，他便对妈说：“我是耍死的人了，你何必带着你们跟着我拖呢？我们不能都死在这里，能留一条命就要留一条命。以后，仇要靠你们来报，门户也要靠你们来支撑，都死

了怎么办呢？”说得妈和我们都只晓得哭，父亲也止不住自己的眼泪。他怎么能够不伤心呢？明知这一走，以后就难得看到自己的亲骨肉了！但为了留一条命就是一条命，为了让我们永远记住这深仇大恨，长大了好替国家出力，他不得不狠心赶我们走。但是，不管父亲怎么说，我们还是沒有动。看看无效，父亲发了脾气，说：“你们再不走，我就先死在这里！”说完就撑起身板，要动手找东西自杀，吓得我们连忙把他按住，大家在一起又抱头痛哭了好久，最后还是只好答应我们先走。在留下了后会的地点以后（我们也知道这沒有有什么用！），我们终于忍痛含恨，离别了一贫如洗而又被病魔紧紧纏住的父亲，登上了赶厂的途程。

按照父亲指给的小路，我们绕过了日伪军已经侵占的地区，饥餐露宿，好容易赶上了工厂，我们的满腔希望完全破灭了，不仅沒有讨到救济借到錢，而且连父亲的饭碗也因本人不能按期赶到而敲碎了。以后，我们在万恶的黑暗社会里，熬过了多少艰难困苦的岁月，抗战胜利后也一直都沒有能够再见到我们的父亲，也沒有能够再得到他的任何信息！以前我还认为是命里注定的，我也只把这仇恨看成民族压迫。解放后，我才懂得，这是阶级压迫，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，抛弃了我们，任我们受帝国主义宰割，这仇恨我们世世代代是不能忘记的。

亲爱的父亲，您可知道，您的儿女们已经生活在一个美好的环境里？您可知道，您的儿子已经找到了固定的工作岗位，而且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？您可知道，您不

仅有了一个同样有着固定的工作岗位的儿媳妇，而且还有了两个乖乖胖胖的小孙孙？父亲呵，如果您能看到今天的社会，看到党怎样领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武汉，如果您也站在建设的岗位上，您会怎样的高兴、会怎样的忘我劳动呵！

黄安錫記

旧恨新爱話漁村

花山公社山湖大队 李煜海 李开本

市郊花山公社的山北里村，是个風景秀丽的地方。清澈的严东湖，在面前展现一幅烟波浩渺的画图，鸡笼山和龙骨山，合抱着近三百家的村庄，杂树萦绕，红莲相映，稻田墨綠，野花丛生。谁不说这是个江南的魚米之乡。

可是，美丽的山北里呵，有谁知道你那血泪的岁月！

远的不说，就说抗日战争时期吧。我们这里出了个大恶霸李礼臣（李天富），仗着日寇和汉奸的势力，遮住驼子店乡一块天，除他之外还有个第二号人物叫李开春。他们说禁湖，谁也不敢搅草；他们说收款，谁也不敢交魚。那李开春一年唱两台大戏，聚赌抽头，强奸妇女，连同宗的妹妹也不放过。那时，山北里的农民，主要是靠打魚卖魚为业，辛辛苦苦几个血汗錢，都叫他们刮光了。渔民李开炎，租了李礼臣一条破船，带着怀孕的妻子，不分昼夜的在風浪里打滚，每天还捞不到下锅米。那天，妻子分娩了，娃娃落地连剪脐带的剪刀都沒有，只有用菜刀割。翻遍船舱连破布都沒有一块，只有摘几片荷叶，将婴儿包起来，可怜的孩子，他到世上来，连纱也沒有一寸是屬於他的！

天近傍晚，渔船都归来了，李开炎噙着泪水将渔船拢了岸。忽然，李礼臣戴着墨眼镜，甩着文明棍，领着他的狗腿子大摇大摆走来。他朝舱内一瞄，只有几条僵死的白鱼，顿时把眼镜一摘，白眼一翻，哼了一声，说：“不收！”开炎一听，吓



的胆颤心惊，谁知道这句话里是凶是吉？他的妻子也爬上岸，拉着李礼臣的衣角苦苦哀求，结果还是不收。这情景激起了青年渔民李所安的愤怒，挺身而出，替李开炎打抱不平，其余的渔民也来声援。李礼臣一見人多势众，转头就走，谁知，一场大祸临头了。天刚黑，李礼臣带了一群伪军来到李所安的家，踢开了大门，捆住了所安，堵住了他的嘴，推上了小船，船划到湖心，李礼臣一声叫打，这群疯狗的皮鞭枪

托，沒命的落在李所安身上，一直把腿骨打断，然后扬长而去。李所安打得鲜血淋漓，拚命把船搖回岸，走不得，只有躺在地上爬，流了一路的血。到家就死了！他娘遭此橫禍，心都哭碎了，跑到娘家去找田云卿为他出头打官司，她以为这是娘家的人，该给她出口气，却没有认识田云卿也是恶霸，同李礼臣是一丘之貉，状沒告成，冤沒处伸，只有一索悬梁，死得好苦！

可是，山北里的渔民是不屈服的。从1941年开始，在新四军的领导下，不少渔民参加武工队，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斗争。山北里屬武鄂县政府青山区。在县政委姜蓝平、区长赵印环的领导下，这里成了红色的据点。山北里的渔民和武工队、游击队配合，狠狠的打击了日寇和土匪，杀了恶霸李开春，宰了叛徒李天狗……。一时山北里成了敌人的畏途，谁也不敢越过鸡笼山口一步！严东湖成了敌人的坟墓，有无数的日寇、汉奸、土匪被綁在石头上，装在口袋中沉到湖底！

抗战胜利后，烏云又罩了顶。李礼臣搖身一变，当上了区长，霸了严东湖，渔民又过着流泪的日子了，更可恶的是他逼迫二十多名青年到黄陂武湖去撮魚苗。武湖是个吸血虫成堆的地方。魚苗倒进严东湖了，可是吸血虫病带到了山北里，几年时间，就有十八个青年折磨致死，弄得十一户人家妻离子散，流落四乡！

解放后，党领导我们消灭了吸血虫，斗倒了地主，开展了合作化运动。山北里一跃而为花山地区的先进单位之一。公社化以后，山北里（山湖大队）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

化。如今你到这里来看看，抽水机站把严东湖、清潭湖的水引上了山地梯田，二百六十五户人家都装了电灯，碾米厂日夜机声轧轧。1963年开春，他们大开荒湖，使水田面积增加近两百亩，据估计全年可打粮二十万斤。全队的早谷打了近十三万斤，比去年增产38%。老年人说：“我这一辈子还没见过这样的好收成。”前面提到的李开炎，他现在是小队长，他们队里今年的平均口粮可达一千斤。解放前用荷叶包的孩子，由于养不活夭折了，解放后又添了两个。没有党，没有人民公社，这真是想也不敢想呵。

秋天来了，山湖大队的每个稻场上，堆满了黄沉沉的谷堆，地里，齐腰深的棉花，结桃累累。稻场上日夜挤满了打谷的人群，湖里摆满了送公粮的船只。年老的爹爹婆婆，却在织渔网、修渔网，只等中谷一入仓，他们将驾着八十几条渔船，战斗在严东湖上……。

蔡 培 插画

冤 獄

市郊花山公社 张治全

这事情发生在 1935 年的冬天。

那时候我在汉口拉人力車。拉一天，架子都跑散了，连一升米的錢都沒有弄到手！心想：要是到了腊月，天一下雪，生意更清淡，一家老小更糊不上口，那可怎么办？想到这里，就对坐在身旁的妻子说：“我想回乡下去一趟，找舅母娘打个商量，借担把米，凑合凑合，把这个冬天度过去。”妻子一听这话，楞了半天，说：“别人赏脸就好，要是不赏脸，白去一趟。”

商量到半夜，想不出别的办法来。最后决定还是回乡。

驼子店的繆萧村，有个地主叫萧明贵，别人叫他“二癩痢”。这人已死了，留下一个地主婆，她就是有名的“萧寡妇”——也就是我的舅母娘。萧寡妇和当时的四大金刚里的孙月如又是亲戚，她的大女儿萧焕莲是孙月如的嫂子，茅厕连粪窖，臭到一堆去了。

回乡第二天，好容易在孙月如家里找到了萧寡妇。萧寡妇穿了一双小白鞋，走起路来一扭一扭，眉毛皱成一道，冷冰冰的，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：“你来了！”我一看这

样子就先冷了半截，鼓了半天劲才把几次溜到嘴边的话说了出来：“舅母娘，现在汉口的钱不好赚，我的伢们又多，没有吃的，特为来找你老人家借点米，以后混好了，赚了钱，一定还你！”萧寡妇不说借与不借，反装穷叫起苦来：“唉呀，我也正为难呵，你舅父死了后，我一个妇道人家真不好办……。”但为了把我推出门去，就说：“好吧，等两天我回去了，你再来，借担把谷给你。现在你先回去。”我听了这话，信以为真。

从孙月如家出来，天已经下起雪来了。心想：我再住上两天，家里吃什么呢，未必捆着肚子挨饿？于是，又回转身到了缪萧村舅母家。我想，反正借谷的事你已经答应了，要是能马上挑到谷，明天一早赶回去，那不更好？一进门，就看见堂屋里摆着一担谷和半箩筐米。萧寡妇的二姑娘在家，我跟她一说，二姑娘就同意先把这担谷给我。百多斤重的一担谷，一个人还不好把它搬回汉口，我又去叫来叔伯兄弟治谷和治林，三人一起挑到张家祠堂，连夜整成米，第二天运回了汉口。

第二天，萧寡妇回来，知道我把一担谷已经挑走了。这个平日穷人向她借一升米都舍不得的地主婆，一听冒了火，她恨不得立即把这担谷追回来。就急忙去找孙月如帮忙。孙月如正在床上眯着眼睛抽大烟，听到这件事，精神马上来了。把烟枪一放，带着一脸奸笑，从床上坐起，装着卫护萧寡妇的样子，其实还不是想弄萧寡妇几个钱。连连说：“这还了得？这还了得？”便出了一个害人的主意，写了一张状纸，上

法院告了我的“搶案”。

我在汉口听说了这事，非常气愤：“这明明是亲口答应借的，现在把我告成搶犯，我还要找她把这事情弄清楚，给我洗掉这个污名！”可是，我一回到驼子店，求这个出来给说句公道话，这个不管；求那个出来说句公道话，那个也不理。原来孙月如早给地方上绅士们打过招呼，叫他们不要管这件事。把我急得像鸡子抓心，真是喊天天不应，叫地地无声。

状子一到法院，第三天传票就下来了，传我和治谷、治林三个人去过堂。治林一听说传他，魂都吓掉了，逃到别处躲了起来；治谷是个二十五、六岁的小伙子，他还以为旧社会可以“有理走遍天下”，对我说：“这怕什么？我陪你到法院去过堂，未必法院不讲道理？”那时候，他哪里懂得，旧社会是“衙門八字开，有理无錢莫进来”！法院就是架在工农头上的一把刀！

过堂的那一天，在武昌地方法院的法庭上，一个干骨头瘦架子的法官，坐在上面，下面一边站着我和治谷，孤孤单单两个人，另一边站着萧寡妇和她两个姑娘，另外还有孙月如、联保主任梁国瑾，还有一个律师。萧寡妇强词夺理的诬告我搶走了三石原熟米，还撬开了她的箱子，搶走了一个八十两重的元宝，几百块现洋和许多衣服。我和治谷越听越气，几次出来爭辯，几次都叫法官打了回去。等到法官叫我说话时，只说了一半，萧寡妇請的律师就站了起来，打断了话。律师七说八说抖了一大篇，说到最后，只听到说根据什么法，他们两人应该判重刑。我再也忍不住了，

气得一双眼睛冒血筋，瞪着台上的法官，吼起来：“你们连黑白都分不清，还审什么案子？我们没有抢人家的东西，我们也沒犯什么法，这是冤枉，冤枉！”

审完后，法官就把我们两人下了牢，而且分开关在两个号子里，分开时，我对治谷说：“对不住你，把你连累了！”治谷这时还安慰我：“不怕，官司总会要打明白的，我们一不是坏人，二不是抢犯，随他们说到那里去，我们也不怕。”他到这时还不懂，旧社会哪里有穷人一块天？

一关关了半月。半个月后，过第二次堂。这一次四大金刚里的另一个金刚李若夫也来了，审讯开始，联保主任梁国瑾首先出来作证，说上一次萧寡妇告的，全都属实。萧寡妇的律师马上接上来说：“人证确凿，应该判刑”。他们这一套从头到尾在审讯前就已经安排好了。又过了半个月，判决下来了，判了我五年徒刑，治谷判了两年半。宣判后，萧寡妇得意洋洋，和孙月如有说有笑地走了。几个法警上来，把我们一拥，推下去了。

我回到牢里，同牢的人听了这判决，都替我抱不平，有几个会写字的，替我写了一张状纸，上诉到伪湖北省高等法院。高等法院一样混蛋，批了四个大字：“维持原判”。同牢的人，更是不平，还不死心，又写了一张状纸，送到伪南京最高法院。过了半年，最高法院才批了下来，说案情重大，应该转军法处处理。这一来官司越打越大，冤枉也越来越大了！

转到军法处后，我们两人立即上了手铐，坐的是又脏又臭的黑牢，关在里面不知道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。这时，什

么希望也没有了，官司已经打到了顶，我和治谷越想越气，越气越恨，真是恨不得立刻冲出牢去，把他们抓住，撕成几块才解恨！还恨那三角眼的法官，恨那个拿纹皮包的律师，这些家伙张口国法，闭口国法，可是就是颠倒黑白！我对治谷说：“我们要是死在牢里，二十年后再变一条好汉，这仇也是要报的！”

在军法处坐了一个多月牢，又转县政府，在县政府关了几个月，又转到陆军监狱。有一次，我的妻子又带着两个孩子来探监，由于我的头发足有尺把长，披到了肩上。一双眼睛就像两个黑洞，又大又深。人就剩了一副架子了。把自己的孩子吓得倒退了几步。妻子见我折磨成这样，抓着铁栏栅痛哭起来。这时，两个孩子也跑拢来，拉着娘的衣角，呜呜地哭。我问她怎么生活的？她只是呆呆地望着我，不说一句话。望一阵，又哭一阵。自从我关进牢后，妻子为了两个孩子，白天给人洗衣，晚上给人作针线活，一做做到深更半夜，可是连两顿稀饭都喝不到口。有时，做到半夜，想起我含冤关在牢里，眼泪就像牵线似的，不知哭过多少回？我们还没有谈到几句话，法警就催她离开。她牵着两个孩子走两步，又回头看一看，走两步，又回头看一看。这时，要是萧寡妇、孙月如这帮人站在我面前，我真能一口把他们吞掉！

1937年夏天，日本鬼子快打到武汉，国民党反动派是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，我和治谷才被放了出来，但前途仍是一片黑暗，直到武汉解放，才真正见到了天日。

夏放文記

一半辛酸一半甜

——我在武汉三十年

亨达利钟表店工人工程师 唐家星
市甲等先进工作者

有人说：“做手艺嘛，只要技术好，不管在么时候，走到哪里也不会愁饭吃。”这种说法对不对？不对。我想以我在武汉三十年亲身经历中的一些事实来作一个对证。

我出身于贫农家庭，十三岁（1932年）来武汉学徒。就在当年，父亲在乡下被高利贷拖累得贫病交迫而死。因之，我的四年学徒生活是过得多么悲惨，这是可想而知的。

我在半失业的状况下，半饥半饱地度过了满师后的两三年，后来由徐云廷老师傅^①介绍我到日本钟表商人开设的“森洋行”做修表工。这个森洋行，就是我现在工作的亨达利店址，当时是被日本人侵占着。和我一道被介绍来这里帮工的还有五个人，讲定的工资是每人每月日钞一百元。

^① 徐云廷老师傅就是钟表行业中技术上有名气的“徐矮子”，现还健在，已七十余岁，退休在家。

洋行的日本老板是个矮胖子，鼻子底下一撮鬍鬚，小眼睛，光脑壳。站起来没有三尺长，坐下去像个不倒翁。我们都叫他小鬍子。

这小鬍子心眼真坏，我们做了一个月后，他口里虽假意儿叫道：“大大的辛苦。”却借口生意不好，每人只给五十元的工资，并继续骗我们说：“等生意好了再大大的加工资。”我们知道受骗了，这少的工资当时也很难维持生活，何况原来讲定是一百元呢。因此，我们都收拾了工具，不想干了。这一下可恼怒了这位小鬍子。他小眼一瞪：“什么！不干活？统



统是新四军，送宪兵队死了死了的。”说着就将我们六个人关进了店后的防空洞。

我们的心都紧了起来！谁不知宪兵队就是阎王殿啊！不久前，一个同行，仅只为得罪了一个翻译，被诬告买了一只“偷”的手表，头一天活鲜鲜的人进宪兵队去，第二天用门板抬出来，当时就断了气。我们会不会也是那样啊！

第二天，介绍我们的徐老师傅因介绍了“坏人”挨了重重的两耳光，他的爱人因插了两句言语，被小鬍子拳打足踢，打得遍体鳞伤。我们这些“新四军”呢，并没有送宪兵队，只是被逼迫着忍气吞声地在森洋行做了六年牛马。

六年呵！这漫长的年月，我们是胆战心惊，敢怒而不敢言地度过的。一直到抗日胜利，我们才算结束了这一段牛马似的生活。

在国民党统治武汉的日子里，我们手艺人还是没有摆脱灾难。当时什么“老法币”、“新法币”、“关金”、“金元券”，搞得人昏头昏脑。蒋匪印钞票来不及，就干脆将两元票面加上20万的戳子，当20万元通用。这时，物价飞涨，投机商人，囤积居奇；贪官污吏，狼狈为奸。手艺人真难活命哪！

我家里是饥一餐饱一顿，苦不堪言。我的第一个孩子仅一岁半的时候得了重病，我抱着那烧得发烫的小身体，跑遍了好几个挂着“赤贫送诊”的私人诊所，结果他们都是用没有药品的借口将我推了出来。当我将孩子抱到市立医院时，医院里必须要先缴三十块银洋的住院费。哪里去找这多钱啊！我那个可爱的孩子，在我抱着他离开医院的途中，永远

闭上了他的小眼睛！我的第二个孩子，由于大人身体严重衰弱而早产，出世后就夭折了。

我眼睁睁看着孩子一个个死去；眼睁睁看到家里缺米少煤，我还弄得背上不少高利贷。这痛苦的日子，何时才是尽头啊！当时我真想自杀。

但，严寒封锁不了春天，黑夜阻挡不住太阳。武汉终于解放了！

在解放后的日子里，由于物价稳定，生活有了保障，更由于党的教养，使我从浑浑噩噩中渐渐醒悟过来，开始懂得了生活的意义，因而在工作中取得了一些微小的成绩。这就多次被评为行业和系统的先进生产者。在党的不断培育下，我于1956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于1959年还出席了省、市召开的先进生产（工作）者会议和省二届市三届党代会，并荣幸地两次见到了敬爱的领袖毛主席。1959年被市人委命名为工人工程师。说实在的，我这个在旧社会历尽了辛酸艰苦，现在翻了身的手艺人，怎么会不感到是最大的愉快和幸福啊！

现在，我只要每天上班时见到了那个已经做仓库的防空洞，就能勾起我一段痛切的回忆来；只要看到我现在活蹦乱跳的三个孩子，就能引起我对万恶国民党的无比愤恨！

同样是在武汉，同样是我这个手艺人，现在，我还同样是在亨达利这块地方，但我个人的遭遇却是和整个武汉的历史命运相互关联着的。

关于这些，难道能说是“只要技术好，在么时候都不会

愁饭吃”吗？关于这些，难道还不清楚地说明唯有共产党才是劳动人民的救星吗？

我要永远跟着党，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党的伟大事业贡献出一切力量！

王静波整理 白纯熙插画

我的腰为什么是弯的？

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 谢从勤

现在经常有些同志问我：“你年轻的，腰为什么总伸不直”？这伸不直的腰，还有这麻木的双腿，和我脸上的伤疤，都是旧社会罪恶的见证。直到现在，每逢下雨或阴天的时候，还隐隐作痛。这些痛苦，我一生也不会忘记的。

1947年4月，我才十一岁，就开始了学徒生活。

第一次，我在汉口单洞门一家皮箱商店当学徒。早上四点钟起床，晚上十二点以后才睡觉。那时我又瘦又小，每天老板要我挑八到十个大皮箱，到大智路的一家商店出卖，往返时间限定一小时，超过时间，回去就要罚跪，或者用锤子、钉子在我头上乱打，连剩菜剩饭也不给吃。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瘦，不到三个月，就得了压伤病（脓胸）。

后来，我在新香港食品商店当学徒，在这里，整天的抬面粉，抬煤倒煤灰，病情也更加严重。狠心的老板，反而在严寒的冬天，把我调进一间四面通风的破房子里合面粉。

有一天夜里，外面下着大雪，北风吹得破屋摇摇欲倒。老板在半夜派人把我叫起来，要我在六点钟前合好三袋面粉。我在寒风刺骨的破屋内，上身披着面粉袋，下身穿着一

条破烂的短裤，站在冰凉的冷水池里，合了半小时，双腿麻木，失去了知觉。我便出来，用手摩擦双脚取暖。正在这时，老板披着狐皮大衣查看来了，见着我，就打了几耳光，接着又踢了我一阵，把我踢倒在地上晕了过去。最后师傅们把我抬进了面包炉房，半个多小时，我才苏醒过来。我的压伤病越来越重，资本家看我不中用，就把我赶出了店。白天我在华中里一带讨饭，晚上就睡在如今江汉路百货公司中心商店的墙脚下面。

1948年，我到江汉路国际理发店当学徒，资本家都是一样的恶毒，一天要我干十五六小时的繁重劳动，吃的仍是老板的残菜剩饭。有一天，我整天没吃上饭，老板还逼我去挑煤球，刚挑上楼的时候，眼睛突然发花，晕倒在地上。老板反说我装病，打了我几耳光。端午节那天，全店休息，要我一个人看门，我把一碗剩饭给了一个讨饭的老太婆，老板在楼上看见了，走下楼来，不声不响的揪住我的耳朵，抓住他儿子玩的棒子，劈头劈脑乱打，打得我遍身流血，连棒子也打断了，还跪了两个多小时，一天不准吃饭，说我给别人吃了，要扣回来。还有一次老板叫我烧发夹子，我从未烧过，不知怎样烧，放在炉里烧红了拿给他时，他接过手就往我脸上一触，把我脸烧了一个很大的泡，脸肿得很大，喝水时嘴都张不开，烂了半个多月。直到现在脸上还留下一块伤疤。

武汉解放初期，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，资本家看到我压伤病更重了，又把我一脚踢出了店。1950年2月，在工会组织支持下，我才恢复了工作。

领导上看我压伤病很重，便设法为我医治，在治病期间，特别照顾我吃小灶。在党的关怀下，病很快的治好了。我从一字不识的文盲，现在提高到初中的文化水平。1955年光荣的参加了共产党。在1954年到1960年中，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，省直和本系统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。曾出席过省市民兵代表会议。这都是党和国家培养教育的结果，是我在旧社会做梦也没有想到的。

长办宣传部供稿

从乞丐到人民代表

礄口区人民代表 陈 彩

要说我的身世，是几天几夜也说不完的。比如说丈夫养不起我，我在乡里讨饭，我眼看到第二个孩子饿死留下奶去给有钱人家当奶妈；我在走投无路时，母子三人曾两次把门闩起，准备饿死……这样的苦，我度过三十二年，都是在农村，那就不提了，只说说我到汉口来求生。

我到汉口来，是听别人劝。他们说：“彭嫂子，现在乡里很难讨到口剩饭，你到汉口去吧，或许那里好讨一些。”携儿带女我就到宝善巷来落脚了。过去的宝善巷是茅棚，稀稀落落，有的是菜园、湖淌、臭水沟，到处丢的是尸首。人家说宝善巷是：臭气冲天，尸骨露天，蚊蝇遮天，鬼火照天。旧社会谁瞄我们一眼。

开头几年还算好，大儿子卖糖，我替别人洗衣，后来儿子大了改收旧货，勉强混得一口饭吃。饿怕了的人，能混过半饱也是“福”了。谁知好景不长。有一天流氓李少华对我儿子说：“你们做旧货的出了岔子，警察局要来捉人，你赶快到我朋友家去躲一躲！”我儿子哪晓得他们的诡计，也没同我讲一声就“躲”去了。一天，两天还不回来，后来我四处

打听，才知道是流氓将他骗走卖给了“皇卫军”当壮丁开到蔡甸去了。可怜，我哭得死去活来，一步一滴泪的到蔡甸去找，结果没有下落。半年之后，日本鬼撤退，他开小差到汉口，才找机会逃出虎口。

儿子回来后，他爹也从鞋铺失业回来了。我想尽千方百计租来一辆人力车给他们拉。那兵荒马乱的世道，有多少人坐车子！交不起车租，“江德记”的老板就将我丈夫吊起来打，整整吊了两天，喊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我到哪里去伸冤呵！这还不说。1948年，我儿子改为踩三轮车。有个大流氓和惯盗余茗货，硬要我们把车给他踩，我儿子不肯，他就怀恨在心。有一次，余茗货因为盗窃某布铺的布匹被捕了。在审问时，要他交代谁叫他偷的？这个强盗就一口咬定是我儿子彭松林。伪警察局不分青红皂白，将我儿子抓去，用大杠子压。我还记得那天是端午节，我去看他，只见他压得呼天喊地，舌头都压出来了。当时我真是钢刀挖心。我在警察局门口哭了一天，哭得昏倒在地。余茗货那个该杀的看到私仇已报，又加上引起群众公愤，才松口说他自作主张偷的。到这时警察局还不放松林，又关了七天。恶人当道，好人受苦——那个世界就是这样。

丈夫交不起车租，被老板打后关起来了；儿子又打得卧床不起，家里生活无着落；我只得又提起讨饭篮到大街小巷去讨饭了。讨饭该是走到绝路上吧，可是保甲长还不放过。有一天，甲长向大熊对我吼道：“讨饭婆，我儿子‘拿八字’，你给我来五块钱的会吧！”说完掉头就走。以后天天来逼我

交会錢。我交不出，他就罵：“什么？不来？好不识抬举的讨饭婆。我说了算数，不来也要来！”这些地头蛇我们得罪得了吗？没办法，只有忍饥挨餓，东拼西凑弄了五块光洋给他。过了几天，向大熊对我说：“讨饭婆，我的会不来了。”我心里一喜，连忙找他讨錢，他把脸一变，刷的打来两嘴巴：“我怕你穷糊塗了！几时差你的会錢？岂有此理！以后再要，休怪老子无情！”

同志们，旧社会的反动派、流氓、反动资产阶级就是这样的在我们头上屎屎尿尿，真是黑了天呵！解放后，我们一家人重見天日了。我现在还住在宝善巷，这里完全变了，哪一家哪一户一天到黑沒有笑声？我今年五十多岁，在当六角亭街壳莲厂的厂长，党支部书记，又当选为硚口区的人民代表。其实我这个讨过饭的家庭妇女做得了什么？都是党和人民给我的光荣。我活一天，还要为社会主义奋斗一天！

刘先治记录整理

一般引水两重天

长航局汉宜线大引水 范希桥

我家很穷，十四岁就到汉口轮船上做“西崽”，做“西崽”受了很多苦，但学到会做引水。日寇侵占汉口，我便回乡不当引水了。

好容易望到日本人投降，我又到汉口来，指望能做引水。那时李雨田霸占着海员工会，他是武汉红帮流氓头子杨庆山的拜把兄弟、国民党社会部长谷正纲面前的专员、上海反动头子杨虎的門生。汉口国民党宪兵队特高科长、武汉行轅谍报处长、警备稽查处长都是他工会的“会外十人团”组织成员。他的结拜兄弟吴大林是他的打手头子，随身带有手枪，海员工人不听他的话，他就任意打骂和扣押，甚至把人打死。

李雨田的工会，比衙門还狠，見人就要錢。引水部門是他的拜把兄弟夏锦章把持的。李雨田规定引水賺的錢都要给他，再由他把几个錢你吃饭。许多引水不願将自己賺的錢交给他，不入他的帮，就在外面做“野鸡”引水（自己在外找船引）。李雨田怀恨这些不听他的话的人，就采取“打倒一个，吓倒一排”的办法，要整治一个引水工人，使其他的引

水都服贴他。谁知，灾难就落到我的头上来了。本来我是去登过记的，可是李雨田不让登记。为了生活，我只得做“野鸡”引水。1946年腊月初，我引一条上海的小船到宜昌，当船行到沙市，碰到引水李青山，他对我说：“李雨田、夏锦章晓得你做引水，已派人在宜昌捉你，你不能去宜昌。”没有办法，只得请李青山帮我把我这船引走，他又接了一条绍丰轮，叫我引到汉口，解了我的围。



俗语说：跑了和尚，跑不了庙。我躲得开宜昌，躲不开汉口。腊月二十日，船到汉口，靠在江汉关下面的码头上。我正准备上岸，李雨田派来了陈保廷、陈高才、郑明新三个打手。他们一上船就凶恶地对我吼道：“把东西放下，跟我们到会上（李雨田的工会）去一趟！”我说了一大些好话还是不放，拉拉扯扯地把我弄到民生路金大楼旅馆楼上一间房里。我抬头一看，房里两边坐满了引水。我就明白了，这是李雨田布置整我的地方。正在这时，左德益气汹汹进房来，随手把房门一关，走上前来照着我的头就是一大巴掌，打得我眼冒金花，鼻血直流，接着就是拳打脚踢，又抓到一个四方木凳，准备照着我的头上狠狠地打来。我正来不及躲开，忽然房门一下被人推开了，将拿的木凳撞到一边。要不是老引水叶玉有连忙扯住说好话，我就遭到毒手了！

接着李雨田要我写个不做引水的“具结书”，还要交一百二十元钱给他。那时江是别人的，码头是别人的，我寡不敌众，只有含着泪写了字盖了手印，将来回两趟赚的九十块钱都给了他。可是还缺三十元，我就找到李雨田管钱的施玉恒，请他帮我在李雨田面前说说情，免收这三十元钱。施玉恒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：“打死了也不亏你这狗养的，把钱送来！”没有办法，我只得回家把所有的东西卖光，只卖了二十元钱。那时已经到了腊月二十几了，年内无几日，家里没有米吃，我还得把钱送给李雨田。有天，我在伪海员工会碰到十几个引水，他们知道我的情况后，都很不服地说：“腊月二十几了，还卖东西送钱把他，这比杀人还狠，你总是做不

成的，莫把！我们一道去说。”我和他们一道找到夏锦章，夏锦章一見人多势大，才沒有收我这三十元錢。

从此，我再也不敢做引水了，生活无法过，妻子也改了嫁，剩下一个五岁女儿，我就牵着她到处流浪，过着痛苦的生涯！

武汉解放后，我重見青天，苦难的日子熬出了头。我在旧社会得了肺病，党又花很多錢把病治好了。我重新安了家，也生了个孩子。旧社会跟着我到处流浪的女儿，解放后也结了婚，添了两个外孙。

如今，党培养我当大引水了。我引着人民的巨轮，乘風破浪，航行在幸福的长江上。

叶年祺記 白純熙插画

三次投考民生公司

长航局货8——151 驳船驾长 陈树槐

我当水手近二十年。在旧社会,要想当个水手,真是难上难啊!我进民生轮船公司当水手,就经过三次“考试”,费过许多周折。

旧社会逼得我走投无路。

1941年,民生公司招考水手,我去报考了。当时有一百六十多人考,考的项目,是推划子,游水,以及口试怎样修理木船,收发货物,消防救火等。我是在长江上长大的,靠推划子生活有六七年,年轻力壮。主考的人,见我划子推得好,游水也是行家。就问我的介绍人是哪个?我说是囤船的副水手长。他又问我知道规矩不?我说不知道,他就说:“你回去吧”!我就是这样莫名其妙地“落考”了。

这次取了四十多人,都是啥也不懂的。后来我才知道那些人,不是有背景,就是有錢送礼。主考的人采取“抓生替死”,将考得好的卷子换上这些人的照片和名字。我们这些沒有錢送礼的穷人,就成了别人的代考人。

1943年,我又到民生公司考水手,考的项目,还是老一套。我这次虽懂得了“规矩”,由于礼送得少,主考的说:“你

回去找好铺保，过两天再来。”

我没有找到铺保。两天以后，我再去时，那个家伙竟问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我当时没有弄清他的意思，便说是他叫我来的。他更火了：“谁叫你再来？快滚出去！”我就这样糊里糊涂的被他轰了出来。

1945年，民生公司又招考水手。我完全明白他们考的不是人和技术，而是考的錢和人情关系。为了生活，我也得去考。

事先，我找穷朋友们借了伪法币两万多元，买了二十斤酒，十多只鸡子，三百多个鸡蛋。送了管囤船的头佬四斤酒、三只母鸡，一百多个鸡蛋，给管人事的两个，各送了两斤酒、两只母鸡、六十个鸡蛋。帮我担保的和找铺保的，也各送了三只母鸡、两斤酒。这样，我还不放心，又给那个姓王的管人事的头头，另送了一只两錢五分金戒指。这次，我被“考取”了。但和我一道工作的一个姓许的，因是姓王的同乡，连考都没考，就进来了。旧社会真是烏天黑地，要沒有背景、沒有錢，就寸步难行。

进入民生公司以后，资本家以试用、实习等名义，让我白白的给他们干了半年。逢年过节，还得给上司送礼，平时给他们当佣人，推划子送他们家里人上班上学。好不容易才转为正式工人，但是工资还只能拿到一半。过了大半年，工资虽改拿正份，经过各种名目一扣，就去了一大节。剩的几个錢，还得等上司在银行吃几天利息，才能拿到手。

那时，物价天天上涨，拿到手的錢，只能买几斤小菜。有

一次，资本家拖欠一个多星期不发工资，待发下时，又是支票，没有现钞。支票要到银行去换成本票，才能买东西。而又不准我们请假。眼看几个钱，一天天的变成废纸。为了活命，我们都自动外出去换本票。资本家说我们怠工，硬要开除我们，真是丧尽天良！要不是我们工人齐心，坚决向资本家作斗争，饭碗早就破了。

我考民生公司借的债，直到1948年才还清。

解放后，我和所有的工人一样，再也不愁生活了。1957年，我被提为驳船驾长。1959年，我成了光荣的共产党员。

抚今思昔，我想只有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工作。装卸货物，我总是与水手们一道干，千方百计的保证质量，没有差损过。对待国家的财富，也不让随便浪费掉；四年来，我们扫地脚粮一万二千多斤，上交了粮食部门。

只有努力工作，我才能对得起我们党。

萧亦聪整理

忘不掉的阶级仇

市特等先进生产者 张凤燧

每逢谈到过去，我的心就像火一样烧。

我的老家是鄂城葛店清明巷。从我记事起，家中地无半升。父亲替别人驾船，连他自己也难以维持生活，怎顾得了一家老小！没法子，婆婆和母亲就终年在外讨饭，拉扯着我和两个弟弟过日子。残菜剩羹把我养到六岁，娘对我说：“孩子，你已经长大了，也该去讨点东西来湊合湊合呵！”于是，我也端着破碗，瞪着乞怜的眼睛走上“生活”的道路了。记得第二年冬天的一个下午，大雪纷飞，刺骨的西北风呼呼地吹得人站不住脚，冻得浑身发紫，我还得出去讨呵。当我跨进地主的门坎，还没开口要，一条恶狗从屋里窜了出来，吓得我掉头就跑。又冷又饿人又小，怎么跑得赢狗，吓得大哭大叫，结果腿被它咬了几口，我扑倒在地，血把雪地都染红了一大块。没钱医，只有让伤口溃烂，一直烂了两年。至如今，我的左腿上还留着几个碗口大的伤疤，这是旧社会烙在我身上的印记！

八岁的时候，父亲得痲病死了，没钱买棺材，母亲就把家里仅有的一个大柜拆开，拼成“棺材”。随后就把我送到

地主家去放牛，挨打受罵是家常便飯，這就用不着說了。到我十四歲那年，小弟弟被大肚子病折磨死，雖然我給地主干了几年活，還弄不到一塊遮尸布，更談不上討口木匣子了。沒辦法，母親用一張芦席將弟弟卷着埋了。十六歲那年，婆婆又病死，總不能將婆婆用席子卷着埋呵，走投無路，只有拆掉門板，釘成“棺材”。這就是三代人死後的結局，你叫我怎不恨那個富人有“命”，窮人無“命”的世界！

就在祖母去世的那一年，我含着眼淚，兩手空空的離開地主家，到漢口一家親戚的家里學打襪子。心想：城里总比家里強吧，親戚總會照看一點吧。哪曉得天下烏鴉一般黑，我只是從這個火坑跳到那個火坑。在他們家里，起早摸黑，跑腿听差，洗屎布、倒尿桶，像奴才一樣。記得有一天，老板要我剝蓮子米，一連剝了几个鐘頭，手指頭都剝腫了。老板跑來一看，嫌我剝少了還不说，一口咬定我偷吃了蓮米。我不承認，他黑白不分毒打我一頓，那時候叫我到哪里去說理。至于賺錢更是作夢，他家堆着賣不完的襪子，從來沒給我穿一雙。有年冬天，我腳生凍瘡，爛了兩個月，他氣都不吭一聲。二十二歲的時候，別人給我說了門親事，回家結婚時，我連一件衣服也做不起，當時我已出師整整三年了。沒辦法，只有去求地主借件袍子拜天地。後來地主打听到我是个窮光蛋，結婚第三天就將袍子要走了！同志們，地主階級、資產階級就是這樣剝削我、欺壓我，吸了我二十多年的血！

解放後，我徹底翻身了。參加了荊江分洪工程後，在供

电所汉阳工段当工人。那时的汉阳龟山，也像刚刚翻身一样。有一天我们开一辆吉普车到这里来勘察线路，整个汉阳都轰动了。从那时架线起，我就以汉阳为起点，开始了巡线生活。电线随着祖国的发展，不断向农村伸去，我感到责任更加重了。从汉阳到汉川等地，沿线几百几十根电杆，每一根线、每一个瓷瓶，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七八年来，我来回走了近三万里路，爬山越岭，淌水下田，不论是烈日当空、霜天雪地，我也感到工作得幸福。1962年7月2日下午，我朝马口线走去，刚走近54号电杆，就听到“吱吱”的放电声，一时判断不出哪个瓷瓶坏了，在杆下听了一个多小时。这时天黑了，又饥又渴，就到一位社员家弄饭吃。准备休息。洗抹时，我又一次看到腿上的伤疤，涌现了当年农村苦难生活的记忆。看看如今的农村是多么幸福呵。想着想着，那“吱吱”的放电声断断续续在脑中叫，好像对我说：现在沿线农民正在排渍，如果瓷瓶坏了，一定影响生产，快去检查。于是又背起工具袋回到54号电杆去。这时夜很静，我判断出有个瓷瓶局部漏电，马上不会出问题，才放心去休息。第二天就派人修好了。

祖国一天天在变，农村用电一天天在增加，我愿意为工业农业安全用电献出一生，永远巡查在高压线路上。

閔布铸整理

仇和恨的家譜

—紗厂女工 魯巧英

旧社会，地主资本家是喜欢叙家谱的，写他们如何家大业大，有福有祿，儿孙满堂，光宗耀祖。我也有一本记录旧社会罪恶的家谱，是血和泪的家谱，是仇和恨的家谱，是告诉后代永远不忘阶级仇恨的家谱。

旧社会，我家上无片瓦，下无寸土，爹妈养了我们八个，我是最小的女儿。九张嘴张着靠父亲打鱼来养活。那时候江河湖堰哪瓢水没有主，容你自打自得吗？养不活呵！遇到下雪下雨，捕不到鱼，一家人只有饿肚子。与其都在穷网里死，不如放一两个逃生去；爹妈万般无奈，就将两个姐姐送进了育婴堂。“育婴堂，閻罗殿，去了就在小鬼身边转。”两个姐姐从此渺无音讯了。照说日子会好一点吧？不！没好久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又饿死了。可怜的父亲，看到连丢五个孩子，就拚死拚活的干，指望把余下的几口养活，哪晓得劳累过度，一撒手把眼睛闭了！塌了天呵，凭娘一个人怎么拉扯住四口之家！没办法，只得将唯一的姐姐送给人家当童养媳。去了两年也被折磨死了。只落得孤儿寡母三人，相依为命。有一天，母亲走娘家，半路上忽然钻出一群流氓，

把她搶走，卖了二百块钱。从此，只剩下十一岁的哥哥楚南和我了，举目无亲，饥寒交迫，哪一个看着我们不流泪？只有黑心的地主还在我们身上打主意，他看到哥哥可以压榨，就将他弄去放牛种地，喝穷人最后一滴血。我呢，被人送给鲁家当童养媳。几年功夫，十口之家死的死了，散的散了，树枯叶落，鱼死网破，旧社会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！

鲁家也是条穷根。公公是修船工人，也是家大口阔，奶奶、婆婆、大伯子、小叔、一个小姑，加上我是八口之家。还是经常靠野菜活命。不久，婆婆将小姑送给人家当童养媳，又抱了两个姑娘，准备将来给大伯子、小叔作媳妇，因此就有九张嘴了。1931年发了大水，家里冲得精光精光，走投无路，公公就将我的未婚夫送去当长工，他挑了一担箩筐，扶老携少逃荒到武昌来了。当时我只有九岁。就随着大伯子（未婚夫的哥哥）鲁明才，到一纱厂当包身工。我生得又小又瘦，每天太阳没出就上工，日头落土才回家，做了三年，资本家没给一个钱，还挨尽工头的打骂。有一天，鲁明才和工头吵了几句，工头把眼一鼓、腰一叉，骂道：“小杂种，还跟老子顶嘴，跟老子滚！”第二天，明才就被开除了。明才被生活逼得没办法，到青山去卖萝卜。有天，没饭吃，在河里洗萝卜吃，头一晕倒在河里淹死了。真是祸不单行，我的未婚夫在地主家累得得了重病，把婆婆急得像疯子一样。

1937年，日本帝国主义打来了，到处杀人放火，强奸掳掠。公公婆婆怕大媳妇遭鬼子残害，把她送到乡下，我



因为长得矮小没有去。有一回，鬼子下乡打拐了，嫂子就和一些姑娘躲到芦苇丛里，谁知被鬼子发觉，抓着她要进行奸污，可怜的嫂子一下吓疯了，不久也死去。未婚夫和弟弟又被鬼子抓去做苦力，公公偏偏又卧床不起。乱棒子一阵一阵的打在穷人头上，真是黑了天呵。这还不算，日本鬼还将铁栅栏架在我家门口，进也进不得，出也出不得。生活无着，我只有去拣破烂度日。有一次，我偷偷钻出铁栅栏，被鬼子发现了，一直追到家里来。公公跪下来求情，这些可恶的东

西却一阵拳打脚踢，活活的将他打死。临终时，他对我说：“孩子……亡国的耻辱……要记……记住，血海深仇要报呵！……”

抗战胜利了，工人指望可以过好生活，哪知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美帝国主义，一样骑在工人头上，敲骨吸髓。这时我结了婚，爱人身体坏，不能劳动，就靠我一人在纱厂做工。咳，那苦是说不尽了，封建把头在你头上拉屎，逢年过节还得送礼，一点不好就扣工资。做半个月只能拿七八天的工钱，其余的七折八扣扣光了。物价又是一日三涨，一家人连稀饭也吃不上。至于政治权利一点也没有，出门要搜身，把工人当强盗。我们年年月月纺纱织布，花衣是别人穿。哪一根纱，哪一寸布，没有我们的眼泪滴在上面。要不是解放了，我们鲁家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活在世间！有没有人知道我的苦难家史。

再看看如今吧，爱人的弟弟明炎当了食品厂的干部，哥哥楚南在武钢工作。家里吃的穿的用的样样俱全，还盖了新瓦屋。不说大家也想得到了：这是党给我们的，是社会主义给我们的。由于我努力作了一点事，差不多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，1952年加入了共产党。现在我有了五个孩子，二个上中学，三个上小学。婆婆在家里料理（爱人由于在旧社会劳累过度，得了肺病，1954年病故），一家人和和睦睦，幸福得很。我经常将家史讲给孩子们听，要他们记住阶级仇恨，将来成为可靠的接班人。

一纱厂北场总支整理 陈貽福插画

育嬰堂恨

武聖路小學 方春霞

每當我看見孩子們在舞台上歡樂地唱歌跳舞，在操場上嬉笑追逐，在教室裡無憂無慮地讀書的時候，就想起了我悲慘的童年，心情便無法平靜下來。

一提起武昌花園山育嬰堂，誰不仇恨。而我却是這活棺材裡僥倖留下來的孤兒。花園山育嬰堂，這濃血污穢的屠場、這悲哀充塞的囚牢、這黑暗的人間地獄，美帝國主義披着慈善的外衣，在這兒殺害了成千上萬的嬰兒，一百個中間難得有一兩個活下來。我生長在魔窟裡，親眼見過許許多多慘無人道的事情，我就是美帝國主義殺害中國兒童的見證人，我心中燃燒着仇恨的怒火。今天的年青人或許以為那兒有孩子天真的憨笑，有花園、有歌聲、有玩具……吧！沒有。那兒只有陰森森的教堂，一股腐惡的氣味。大一點的孩子穿着麻袋似的又黑又髒的破衣，骨瘦如柴，痴痴呆呆的樣子。即使養得有紅似白的送進來，過不幾天，不死也只剩得骨瘦如柴了。養不活自己兒女的貧窮人家，明知這兒是人間地獄，也存着僥倖的心理將孩子送進去，心想總比在家餓死好吧。我的爹媽或許是懷着這種心理將我

丢进这里来。

我和其他的婴儿一样，一进来就被丢在一间恶臭难闻、阴暗潮湿的屋子里。三、四个婴儿挤在一起，白天由一、两个修道和像我这样的孤女“照管”，晚上就沒有人管了。婴儿吃的是美国“救济物资”——坏奶粉和霉米面；喂奶时，橡皮管往婴儿嘴里一塞，烫得婴儿口破血流，惨哭悲啼。有时，婴儿一整天沾不到东西，饿得皮包骨头。婴儿洗脸洗澡，合用一个小盆子，不换水，也不换毛巾，一盆水洗成了污泥浆，臭味难当。婴儿屎尿无人问，一天难得换一次片子，粪便在婴儿背上结成了块块，苍蝇一叮，竟生了蛆。夏天，任蚊子臭虫叮咬，冬天，任寒风刺骨猛吹，十个孩子十个有病，屁股烂成疤，眼屎结成壳。沒有医生给婴儿治病，沒有人疼爱这些小生命。当饥饿和疾病把婴儿折磨得奄奄一息时，就被丢到地下室，结束了短促的一生。有一次，修道逼着我去打扫地下室，吓得我毛骨悚然，心惊肉颤。一只老鼠在啃一个婴儿的眼眶，又一只肥鼠在咬一个女仔的嘴唇和鼻子。婴儿并没死，呻吟、叫喊，真像鬼的世界……不几天，一满篮、一满篮死婴，偷偷地运到后面山上，埋在一条深沟里。

死了谁也不许来要人，因为送进来时，收条上就写着“今后不准来看，也不准来取。”在里面的孩子更不许吵着走。谁要犯了规，动手就打。要是你哭，修道就逼你跪在耶稣面前忏悔，说：“是天主和美国人救了我。我要做本分人，死了上天堂……”

.....

我在这吃人不見血的魔窟里，度过了苦难的童年。我在育婴堂十多年，只知道有美国，不知道有中国，也不知道谁是我的父母；住在长江边不知道有轮船，住在铁路边不知道有火車。武汉解放了，党和毛主席把我从虎口里救了出来，撫育我成长，培养我上初中，读师范，由武汉一师中师毕业后，分配到武圣路小学工作。我已经结了婚，爱人在黄石市五中教书，还生了一个孩子，过着幸福愉快的生活。吃了过去苦，才知今日甜。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：让下一代想想过去，记住过去，做坚强的共产主义的接班人。

当年血泪永不忘

武汉纺织器材厂工人
市乙等先进生产者 方永旺

我的老家，世居汉阳侏儒山。从我生下地起，父母亲因为在家里田无一升、屋无片瓦，就迁到了武汉。认为这大一个城市，随便做点什么总比乡下强些，不会饿死的。可是，父亲一天到晚，起早摸黑，累得透不过气来，还是难以维持一个三口之家的生活，就在我三岁的时候，他被活活折磨死了！

父亲死后，剩下我们母子二人。在这虎穴狼窝的城市里，哪有我们寡妇孤儿活命的地方呵！不得已，母亲便带着我回到了老家。

回家后，母亲帮别人织布，我就每天出去拣柴和挖野菜。1931年，我刚十二岁，这时党在我们这里领导农民闹起了革命，母亲参加了工作，我也入了儿童团。因为母亲给红军送了两次信，后来红军走了，大地主郑贤坤带着还乡团回来，说要捉我们母子去“砍头示众”，我母亲一看情况不好，只好忍着眼泪叫我逃走了，结果，郑贤坤就把我母亲捉去杀死了！

茫茫大地，举目无亲，我无衣无食的四处流浪着。

有一天，我在外面流浪，碰到一伙国民党的军队，他们不由分说的要我帮他们送东西到沙市。后来沿路讨饭，才算活着一条性命回来了。可是，再往哪里去呢？回家吗？别说不敢，也没有家了呀！在这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又只好来到了武汉。

重来武汉，更是举目无亲，凄惨极了！为了生活，我只好白天替别人卖米粑粑，夜晚帮人家拉人力车，几天几夜不睡觉是常事，虽然身体拖垮了，但还是无法维持生活。至于受国民党官警流氓的欺侮，那更是家常便饭了。1945年日本投降后，我认为中国人该总可以出口气了，便借了点钱到南京路崇正里口搭个炉子自己做粑粑卖，哪晓得开张的第一天就飞来横祸，国民党警察六分局的几个警察气势汹汹地赶来连骂带吼地说：“谁叫你在这里烧火？你看，火烟子把别人的房子都熏坏了，不快搬家，老子就捉你去坐班房！”我抬头一看，原来是隔壁的大孚银行里驻扎的国民党空军司令部搞的鬼！可是有什么办法呢？他们官官相卫呀！于是我只有苦说好说送他们一大堆粑粑完事。我想，总算蚀财折灾了吧！不，他们以后每天早晨都来，吃一顿才走。我没有办法，只好设法到中山大道永康里去做，正准备搭灶，哪晓得又出了纰漏。原来国民党军阀的一个大头子刘峙的公馆在这里，他说我有碍秩序，捉去坐了二十多天牢，还罚了二十多块光洋，才算被我的几个穷朋友到处说情借钱把我救出来了。眼见这种生意再也做不下去了，我只好又借点钱去拉人力车，可是在旧社会里，哪有我们穷

人走的路呢？拉人力車也并不比卖粑粑好一些。有一次我拖了个国民党的官由集稼嘴到水厂，走了大半天，累得喘不过气来，等我向他要錢时，他却二话沒说，打了我两巴掌。又一次晚上，一个流氓从新市場出来要我送他到渣滓路，到了以后，他说回去拿錢，叫我等他，结果等到半夜还不見人来，原来我受了骗！像这样的事，我真不知道遇到了多少。可是，在旧社会，像我这样的人，又哪止一个呢？要不是党和毛主席，我这一家人，早就活不下去了。借的债务，直到解放后的1954年才还清！

解放后，我的一家和大家一样，完全变了。两个大儿子党送他们读完了工农中学，参了军，还入了团。四个小儿子有三个进了小学，我和爱人都有工作，每月收入一百多元，家里除了家俱齐全和买了皮鞋、毛皮和料子衣服外，还有手表，吃用全不愁。过去我们向别人借衣服结婚的时候，做梦也沒有想到今天呵！这样，我在工作中劲头更大了，党和政府又给了我很高的荣誉，年年评奖，今年还叫我出席了市的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。说句心里话，当我每次看到毛主席的像时，感激得不知道流过多少次滚烫的眼泪呵！

从做馬到做人

市特等优撫模範
三輪車工人 陈春宝

我在武汉生活了五十三年，父亲以前拉人力車，我也拉人力車。资产阶级讥笑我们：“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生的只能去打洞。”那时节，头顶别人的天，脚踩别人的地，我们不分日夜寒暑的在大街小巷跑呵，跑得骨瘦如柴，还是吞泪当餐。在内街的地面上跑，沒有一条好路，坑坑洼洼，成天吸灰尘吐黑涎；“租界”的路好，我们不能进去，越了界就受巡捕的打和罰。中国的地方外国的主，哪里有什么自由！

1941年5月，日寇统治着武汉。由于水陆交通不便，人力車就成了城乡之间联系的工具。当时汉川湖区有新四军的稅卡，我由于经常往返这一带，所以有时给他们带点医疗器械和药品，或代商人向稅卡办理納稅手續。这些活动，被日寇晓得了。有一天，我在永宁巷街口，忽然迎面跑来五六个家伙，一拥而上将我拳打脚踢，诬我是新四军的密探，打罵之后将我带上铐，送到維新路日本宪兵队。日寇威胁我：“你是个中国兵，我的明白。你不讲话死啦死啦的！”我说“我什么都不知道！”他们和特务狠狠把我抵在牆上。一个日



寇用枪托使尽力气向胸膛打来，打得我实在站不住脚，昏倒在地，他们又用水将我喷醒，说，“你说了给你日钞大大的，放你回家。”我把牙一咬，坚决不暴露新四军的驻地。日寇见利诱不成，又拔出大刀要刺我的胸膛。正在这时，开饭的铃声响了，他们才放下刀将我推到狱中。过了三天，由于逼不出供词，才放我回家。卧病数月，才从死里活过来。如今，一逢天阴骨头作痛，我就记起帝国主义对我的压迫与摧残。

除了受帝国主义的苦，我们还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苦。1948年冬天，狂风大雪。为了一家五口的生活，我披着蓑衣，赤脚草鞋走上街头。街上行人稀少，我挟着车杆

游蕩到武圣路正街口时，一个全副武装的蔣匪军官，气势汹汹的踏上我的車，用手一指，皮靴在車上乱蹬一气，威胁我快拉。沒有办法，我只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跑。好容易拉到集稼嘴，他把脚一踢要我停車。谁知他下了車扬长而去。我抹着汗水赶上前去讨車錢，他不但不给，反身给我两耳光，还罵我：“叫你变人，你变畜牲做馬跳！”一路上的人为我气不平，有的说：“你只当撞到鬼，让他去挨枪弹！”不得已，我只有拉着車走回去！

除了反动派还有封建把头在我们头上撒尿！那时我们也有“工会”，是黄色工会，是特务流氓头子把持的，他们和国民党一个鼻子出气，也和资本家勾结，为非作歹。工会理事长叫赵士斌。身穿西装，腰佩手枪，手下一大批爪牙，专干压迫剝削的勾当，挑拨工人团结。例如1948年夏天，他看到馬車的生意好，自己的收入减少，就在人力車工人中间煽动说：馬車夺了人力車的生意，不赶走馬車，工人沒活路。当时不少工人受了愚弄，在五馬路口与馬車工人发生了流血械斗。结果反动派警察赶来，鸣枪弹压，还将人力車工人刘忠汉等逮捕起来，送到法院审讯。这时赵士斌却做了缩头烏龟，不过问了。这还不算，他还勾结资方，随意高涨車租，巧立名目，收捐收费，谁人拒缴，他就派爪牙拦路勒索。此外，他还侮辱我们的人格，诬人力車工人拾物不缴，逼着要我们穿上印有号码的衣服，像犯人一样，有的車工沒錢买号掛，警察就抓去，说他是偷的車子。可是对車工的福利是一点沒有。冬天，你冻死了他不给一絲棉，夏天你渴死

了他不给一滴水！记得有一天，太阳毒得很，晒得街道像火里烧了的铁板。有个资本家怕晒，坐上車要我快些奔跑。他说：“你快些拉，如果你超过了一辆馬車，就增加你两枚铜板。”当时，我为一家吃口饱饭，不得不拚命和馬車“竞赛”，每超过一辆馬車，资本家就向赶馬的工人说：“你的馬不如我的馬車跑得快！”車快如風，资本家感到凉爽，我却累得汗流如雨，受尽了侮辱！

帝国主义、国民党反动派、封建把头等掌了权的阶级敌人，就是这样奴役我们！

解放了，人力車送进了“博物馆”，我们都改踩三轮車，组织了合作社。車子坏了有修理厂，人病了有医院保健站，政治上有了充分的自由，生活上有了很好的保障，这些是众所周知的了。每年夏天，各个服务站有茶水或酸梅湯，还发给新毛巾，备有药品。特别使人感动的是，合作社的干部，不怕炎天暑热，到江汉桥和长江大桥头，给我们倒茶倒水，送毛巾擦汗，帮着推車上斜坡，交通民警也经常帮着推車上桥，亲如一家。1962年有一天，我拖貨上江汉桥时，帮我推車的是我们的党委书记许文珊同志，这一切是我们做梦也没想到的呵！

两个社会，两种政治地位，两种生活，沒有亲身经历的，人是想也难得想到的。我要时刻不忘阶级仇恨，听党的话，为社会主义的交通事业，献出一生。

舒 华 插画

我也有了名字

市先进生产者 李淑和

在1954年的春天，我到武汉市第一医院做卫生员工作。看到那新建的医院大楼又高大、又美丽，到处都是窗子、到处都是门，我真不知从哪里走好。住院的病员再也不是官僚、资本家，而是劳动人民和国家干部了。特别是我这受苦受难的“奴隶”，也当家做了主人。

进院不几天，医院的工会主席包焕珠同志碰到了我就问起我的名字：

“同志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过去人家喊我婆娘，现在都喊我‘于嫂’，我没有名字呵。”

“现在解放了，你也应该有个名字，于姓是你爱人的姓，你娘家不是姓李吗？”

“是呵，是姓李。那就请主席给我起一个名字吧。”

“好！我来给你起一个。”她想了好半天说：“那么——你以后就叫李淑和好吧？”

“好！好！”

“李淑和！”我高兴的心里直跳，真没想到我活了四十八

年才开始有了名字。那一天连走路吃饭都在想我的名字。我碰着熟人就告诉他，我叫李淑和。有人问我起了一个名字为啥这么高兴？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我过去的苦呵！

我二十七岁那年冬天，家中几天揭不开锅，托人介绍进了河南大学医学院附设妇产科医院。他们说，让我当勤杂工。有一天一个姓刘的官太太到医院生孩子，据说她是伪河南省主席刘峙的小老婆。

“婆娘，去给我端碗面来吃！”她躺在床上说。

“是，太太。”我答应着出去端面。那时天又冷，我衣服又单薄，手也冻僵了，端着面心里又害怕，在递面时泼了汤。谁知她随手就给我几耳光，还要我给她下跪。我不依，她就饱打了我一顿。从那以后，我就编了几句顺口溜偷着念：

“医院住的是官宦，太太小姐白眼看。张口骂，抬手打，勤杂工人最下贱。我们含着眼泪肚里咽，不过为了吃碗饭。”

我丈夫是拉人力车的，一次拉一位官太太，她吵着快！快！并一脚踢倒了我的丈夫，车翻了，谁知她连裤叉也没穿，大家看了哈哈笑。结果她恼羞成怒，喊来伪警察将我丈夫痛打以后，在腿上又捅了一刺刀。我丈夫在医院里快死了，我请假不准，只好偷着去看他。我俩一见面就痛哭起来。他偷偷的说，人家已经把他当了试验品了。不一会来了一个护士，拿一块纱布捂着鼻子把他的伤口给蒙上了。我问：“护士小姐，你怎么不给他上药哇？”她不高兴的说：“腿都要锯呢，还上什么药！”我忙去揭开纱布一看：啊哟！伤口上还

爬着很多的蛆呢。我气的说：“小姐，你看，都生蛆了呀！”“害病嘛还不生蛆。”她说就走了。我只得含着眼泪在那深深的伤口里挤出两碗黑血浆和黑蛆。接着他连着叫了两天两夜就死了。在临死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记住，我是好人被他们杀死的，你要给我报仇呀……”就为这次去看丈夫，医院还要开除我呢。真是：

“过去十年勤杂工，受苦受难又受穷，整天踩在人脚下，血泪染地地也红。”

拨开乌云见青天，五星红旗飘扬在黄河、长江两岸，我从河南来到了武汉。我到武汉市第一医院又做了十年的卫生员了。我再也不是为了饭碗做活，而是为人民服务了。一切都起了新的变化。再也没有人喊我臭婆娘了，而是喊我“同志”、“李淑和”、“大妈”。我亲眼看到武汉的建设，医院新建了大楼，长江大桥、武钢也都建起来了。我的家也从武昌搬到武圣路的新三栋，住上了四层楼的新房子。这一切怎能不让我鼓足十二分的干劲来工作呢？我只是做了我应当做的事情，党和人民却给我很大的荣誉，说我是先进、说我是红旗，可我觉着还差的远呢！

使我终身难忘的是1958年11月，由于党的培养，我被批准入党了。我向党宣誓以后，兴奋的一夜没睡着觉，感到自己的责任更重了。

有人说做卫生员工作还不是刷刷洗洗那一套，我想做卫生员还必须在工作上多找窍门才行。首先应当把医院的卫生搞好，让病人心情愉快的休养，更重要的是关心病人。

对产妇病房，不但要做好清洁卫生，而且要做好宣传工作。爱人家的孩子要胜过爱自己的孩子，为这个我也曾编了几句快板：

“长江水，卷浪花，我的工作要到家。对产妇要勤照顾，多讲无痛分娩法。入院不到几小时，她生了个白胖小娃娃。我给毛毛洗个澡，抱过来，亲亲他。这回我又添个小孙儿，我老婆子心里乐开花。”

总之，想想过去，看看现在，我就有使不完的劲，唱不完的歌。

这笔賬、子孙不能忘

青山环城公社 胡友
白家路大队社员

我是六十六岁的人了。熬了五十二年的地獄生活。旧社会欠了我一笔还不完的血泪債；我父亲是急死的，公公和丈夫是折磨得累死的，十一个孩子被害死七个。这是我的子子孙孙不能忘的苦海深仇！

我小的时候，父母亲在汉口火柴厂做临时工。别人有錢賺让你做几天，沒錢賺一脚踢出来。有时踢出来一餓几天，哥哥餓在床上睡着，妹妹餓得眼泪直流，娘也只有望着我们哭呵！在我十二岁那年，父亲由于操劳太狠，又看到一家老小沒吃的，急得吐血死去。娘养不活我，像割肉一样，在这年将我送到曾家当童养媳。

曾家也是个穷窩子。全家连我八口，住的是四面过風、头顶漏雨的茅草棚，盖的棉絮像猪油渣。全家四个劳动力，除了几亩自耕地，还租地主曾玉清的三十来亩洲地。一年到头还是为别人的粮仓忙，年年闹春荒，靠挖野菜度命，一煮一大锅，沒油沒盐，就像猪食。大小麦出来了，只敢喝稀糊塗。稀糊塗喝完了，抱着升子到处借，借不着就餓。一年

总有大半年打饥荒。

十八岁那年，我“做了大人”——成亲了。接着就分家。分的衣？都穿在身上；分的地？那就更伤心了：我家原来不是有几亩地么？谁知我公公（那年他四十岁）由于拚命干活，累的得了急病，两眼一闭，再也不管我们了！死了连四块板也没有，更不用说找个大柜安葬了，为了把公公抬出去，只好把地押给地主。押了没钱还，就干脆卖给他。丧事一办，零债一还，剩下的钱就是唯一的家当。这次分家，我们就只得了四十串钱。买了点零星用具和锅碗，一文钱也不剩了。没住的，就向湾里叔父要了几根杨树桩，用麦草麻杆搭了一个比鸭棚还不如的小人字棚。从这时起，我们是田无一升，地无一分，只有靠做短工过日子了。

后来，我添孩子了。这总该是喜事吧，我也喜。可是他爹连散工都没有做的，揭不开锅。幸亏邻居一位姓邵的送来一斗碎米，我连干饭也不敢吃一碗，只有一天熬两顿碎米稀饭度命。民国二十年，我又添了一个孩子，情况比这更惨。孩子他爹两天没赚到一个钱，在外面饿了两天，我母子也在家饿了两天。饿得实在没有办法，只好向邻居借二升米，和着野菜煮粥吃。孩子出世的第七天，我只得咬牙起床到亲戚家去借钱。买了斗把多碎米，不几天又光了。我想穷人几时才能熬出头呵！

就在这样的生活下面，我生了十一个小孩，死了一大半。其中四个是生病无钱诊拖死的，两个是被地主富农折磨死的，一个是送到“孤儿院”去死了的。就拿大伢凡操来

说吧，他病在床上沒有錢治，拖了六天。到第七天早上越发沉重了。我到处請人求保，借錢借不到。找湾里地主借高利贷，那个肥胖家伙怕我还不起，鼻子一哼：“沒有錢”，转身就不理人了。我从早上跑到下午，沒借到錢，好容易找药舖求情，才賒了一剂药。等我把药拿回来，伢已经死在床上。

二伢凡燕十一岁就给地主、富农放牛，白天牵牛放，夜晚跟牛睡。到了热天，跳蚤、蚊虫咬得人沒法睡。到了冬天，狼心狗肺的富农还要我那十一岁的伢起五更拣粪，每天拣不到两粪桶猪粪就要挨打受罵。可怜我伢穿的破得像蓑衣的棉衣，打个赤脚，天不亮就起去拣粪。有一天他拣粪转到我住的茅屋前。一阵“姆妈，姆妈，我好冷”的叫声，把我从睡梦中惊醒。我难过的叫他进来，在我被窝里暖一下。我那伢不敢进来，说了声“我不进来，慢点拣不到粪，回去又挨打”，转身就走了。就这样过日子，我的伢十五年时间先后帮了四戶地主、富农做长工。天下老鴉一般黑，最后跳到一家姓尹的地主的家里，带着病还要做活，结果得急病死了。这都是我身上的肉，我的心多么难受啊！

死去的孩子不说了，可怜我饥一口饱一口养大的孩子，还是逃不脱蒋介石那帮土匪的巴掌心。解放前两年，伪保长曾德厚那个坏蛋派壮丁，光派我们穷人。一看他进门，我只有向他说好话求情，筹錢谢他。第一次，他刮走了我八块现洋，第二次又刮走了六块现洋，在一年的时间里，他一共要了我二十次壮丁錢。有一次，我实在沒法筹到錢了，伪保长吼了我一顿。当时我的心也横了，说了句：“你要怎么办就

怎么办吧，钱是没有的”。那个坏蛋就说：“还怕牢里放不下你”！第二天果真派两个乡丁带着枪来抓我的孩子；我的孩子逃走了，他们就将我的丈夫抓去。在路上我丈夫给一个熟悉的乡丁说了无数好话，他们才睁只眼闭只眼让他逃回来，他没有给国民党当成炮灰。谁知苦难的生活将他折磨得不像人，在全国人民抬头见天日的时候，他却离开人世了。

解放后，共产党领导我们搞土地改革，我这个过去被人



欺的童养媳，也当选为贫雇主席团委员。我和大家一起，控诉了旧社会的罪恶，斗倒了地主，分得了田地。土改后，党又引导我们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。我和塆里的贫雇农响应号召，带头参加了互助组、合作社、人民公社。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，我家的生活起了天翻地复的变化。我剩下的两个儿子两个姑娘都结了婚，参加了革命工作，一家人过的很和美。谈住的，现在是三间大瓦屋；谈用具，五屉柜、樟木箱、蚊帐、被单样样有。我在旧社会五十二年，只是成亲那年穿过一件红棉布袄子和一条夹裤，可如今我四季衣服齐全，儿子还给我制了件皮袄。

一想起过去这些说不完的苦，我浑身的劲都来了。新社会是我的天堂，公社就是我的命根。今年我虽然是六十六岁的人了，可是我在队里劳动从来不误工，一个月要做一百多个工分。我这个从地狱翻身翻到天堂的人，怎么能忘记过去的老根本，又怎么能不越做越起劲呢！

程发根记 陈贻福插图

編后小記

自1963年5月16日武汉解放十四周年紀念日起，我們主辦了《我和武汉》征文，到年底为止，共收到群众来稿近八百篇。这里选的是其中较优秀的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。

《我和武汉》征文，是一次群众进行自我阶级教育的活动，是一次群众写家史的創作活动。在党的领导和各级组织及群众支持下，获得了积极的成果。在这些发表了的和未发表的文章中，群众——特别是工农群众，以他们愤怒的笔墨，控诉了旧社会给他们政治上、经济上、文化上的残酷剝削与压迫。这些文章教育了我们不能忘记过去，必须珍惜和捍卫革命的成果，并积极作一个革命者，参加三大革命运动，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。

这本书由于编辑得比较仓促，可能还存在一些缺点。希望广大读者指正。

武汉晚报編輯部